智群慧众

革命群众作品

阳和平思想研究和出版重点工程

阳和平论民主
詹尤克专访阳和平

版 本 1.0

21 世纪革命群众出版社

2024 年 10 月

本书制作说明

本书是将阳和平关于民主的文章搜集整理编出的文集。附录部分是“詹尤克专访阳和平”。

阳和平同志是当代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亲身经历了中国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等重大历史事件，对新中国的历史有十分深刻的研究。灵活的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写出了一篇又一篇文章，为很多青年学生点明了方向。

他的文章都非常有参考价值和学习价值，十分值得我们去读一读，看一看。这几篇他关于民主的文章，同志们看了，应该会有非常大的启迪，能帮助同志们更上一层楼，在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上继续向前迈进。也能让对前途迷茫，一些看法有点问题的同志进步。

要想更好、更深入学习马列毛主义，不知道怎么入门、不知道如何把握学习原则、不知道按照什么书单徐循渐进学习马列毛主义的同志，建议阅读“烈火学社”出版的《马列毛主义学习路线》。

《马列毛主义学习路线》会进行不定期更新，最新版本会发布在墙外 Z-Library 网站上，至少提供 PDF 和 epub 两种格式，署名“烈火学社”，请在 Z-Library 网站上，搜索“马列毛主义学习路线”，查阅下载最新版本。

目录

本书制作说明 i
目录 1
一、关于民主、民心和专政之间关系的几点看法 1
（一）民主问题 1
1.我们为什么要民主？ 1
2.民主和民心的关系 2
3.民主存在的先决条件 4
4.民主与“财主”的区别 6
5.为谁服务的民主阔论？ 8
5.民主标准的评价 10
（二）民心问题 12
1.人性问题 13
2.私心问题 15
（三）专政问题 16
（四）结论 18
二、试论无产阶级的大民主 20
（一）引言 20
（二）社会主义运动失败因素的分析 21
（三）无产阶级大民主的几个根本特点 26
1.无产阶级民主观的理论基础 26
2.无产阶级大民主的经济基础 28
3.无产阶级大民主的追求 29
4.民主和集中之间的辩证关系 32
5.无产阶级大民主的根本任务 33
（四）无产阶级大民主的方式方法 35
1.资产阶级民主的方式方法不适用于无产阶级的大民主 35
2.相对独立的群众组织是无产阶级制约当权者的一个全新的模式 38
3.相对独立的群众组织在共有制下制约当权派的作用 41

（五）结论......46
三、照搬资产阶级民主的幼稚性......47
（一）多党议会制是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否定......48
1.私有制下的多党议会制民主的内涵与共有制民主的区别..48
2.多党议会制必然否定无产阶级的全局利益......51
3.民主集中制的上层建筑与计划经济的经济基础......53
4.无产阶级专政的奋斗目标......54
（二）形式上的民主不能保证工人阶级政权的延续......56
1.所有制的性质决定着民主的内涵......56
2.资产阶级民主的实质是“一元一票”的“财主”......58
（三）法治手段不可能制止走资派的夺权......62
1.法治缺乏对立法者的制约......62
2.有约束力的法规反映着阶级的斗争......64
3.法规是斗争的工具而不是目的......67
四、民主是手段、靠的是专政......69
（一）民主的条件......69
（二）民主的理念......71
（三）民主的手段......73
（四）民主的锻炼......75
（五）民主的功能......77
五、争民主不能靠民主 ——答风雨如等同志......81
（一）无产阶级的民主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条件......81
（二）民主的获得来自非民主的手段......83
（三）资产阶级民主的现状......85
（四）文革的结局并不是民主的匮乏所致......90
附录：詹尤克专访阳和平......93
每月论坛编者按......93
采访正文......94
工人阶级当家做主的时期......99
城市和乡村，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103
社会主义中国的社会福利......110
本书制作说明......112

一、关于民主、民心和专政之间关系的几点看法

（一）民主问题

确实的说，从大多数人的眼光来说民主总比不民主好。就像是排队上车好呢，还是谁的力气大谁先上好，对大多数人来说，民主的方法比较能更好地维护多数人的利益。虽然有时我们也希望决策人能够果断，不要事事搞个全民投票，丢失良机，但是在大问题上，在总体上，我们还是喜欢多数人说了算，而不是少数人说了算。在私有制下，少数人说了算就会是独裁，很有可能损害其它私有者的利益。在公有制下，少数人说了算的话，不光是它会压制多数人的积极性，它也会迟早变公有制为私有制。因此，不论是公有制还是私有制，民主是维护现有制度的一个手段，但是它不是目的。解决每个制度下的一些社会矛盾才是它的目的。这就是说民主有它的阶级性。关于民主是如何为一个阶级的专政服务，我以下还要多说一些。

1.我们为什么要民主?

如果我们更进一步的分析为什么我们喜欢民主，我们就会发现对这一问题的答案也不是超阶级的。其实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对民主的信仰发自于

完全不同的原因。每家资本都希望消灭自己竞争的对手，希望自己成为独裁者，又怕其它独裁者损害他的利益，因此指望民主作为保护自己利益不受其它独裁者侵犯的手段。

无产者与其截然相反，作为无产阶级的一个成员，独裁了就不是无产者了。这就是无产者个人有可能脱离或背叛无产阶级得到个人解放，但是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的解放自己的道理。没有无产者的民主谈不到无产者的解放，民主是它解放的基本条件。因此，无产者渴望民主是他渴望平等，憎恨压迫和剥削的一个表现。因此我们可以这么说：资产者要民主是为了自卫，无产者要民主是为了解放。

2.民主和民心的关系

即便说民主是一个好东西，也不要以为只要民主了，什么就都好了。当前歧视河南人的现象在中国较严重。假如说，今天搞一个全民投票，结果把河南人正式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二等公民。那好吗？不要以为这只是开玩笑。美国南方 60 年代前就有很多通过民主的方法制定的公开歧视黑人的法律，如黑人不得上专为白人办的学校，乘坐专为白人留的车位，饮用专为白人设的饮水器。这些种族歧视的法律只是在 60-70 年代激烈的人权运动后才被废除。

为什么 60 年代以前的民主，会那样公开歧视黑人呢？直接的原因就是当时美国强盛的种族主义思想意识在做怪。这就说明了，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意识形态，也就是民心，在根本上左右着民主的成果。

在中国，人们一谈到民主，很多人就喜欢把中国和美国或西欧作比较。但是中西两者的历史背景，文化传统，经济实力相差太大，不好比。

相对来讲中国和印度可比之处反而更多。印度自称为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它的民主已经实施了 50 多年了。但是那里的劳动人民并没有摆脱受压迫受剥削的命运，贫富差距比中国还大，腐败比中国还严重。印度人选举来选举去，富有的照样富有，贫穷的照样贫穷。即便是中国照搬了印度式的民主，中国劳动人民的命运会比印度的好吗？

去年我在乌有之乡的网上看到了一篇西方第四国际托派的文章。其中革命口号讲得非常响亮，如要武力推翻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粉碎资产阶级的反抗等。文章花了很大的篇幅大谈如何建立各级工人代表大会和以其为基础的权力机构，用工人阶级的民主来捍卫无产阶级专政。看完后我发现好像它认为只要有了工人阶级的民主，一切问题都好办。至于如何克服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本位主义、个人主义、小集团主义和雇佣劳动思想在工人中的影响，如何避免少数地区或企业的工人以局部利益牺牲全局利益

的做法，我没有看到。好像托派们对民心左右着民主成果的现象要么是没有认识，要么是避而不谈。

只要无产者的多数有意识的或无意识的把他们自己解放的道路寄托在有一天自己也能当老板的情况下，也就是指望着自己也能媳妇熬成婆的话，那么资本主义制度就不可能从根本上被推翻。即便是有了工人阶级的民主，它也会迟早变成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民主。这也就是为什么民主只是个手段而不是目的根本的原因。

3.民主存在的先决条件

民主的手段能否起作用，这要看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一般的讲，民主的方法在解决小的利害冲突上管用，但是在大是大非上，在根本的利害冲突上，民主的方法，也就是少数服从多数的方法往往不灵，行不通。只有在大家认为民主不会损害他们的根本利益的情况下，才有少数能够服从多数，用民主的方法解决冲突的可能，民主的方法才能起作用。比如说，西方劳资双方的矛盾，就是一个用谈判、罢工，以各自的实力相威胁，而不是以民主方式来解决冲突的例子。

美国 150 年前的内战就是另外的一个很好的例子。自称民主的美国就未能以民主的方法去协调其南北双方的冲突。要知道这是为什么，就要对其历史有所了解。有人说美国的南北战争是为了取消农奴

制而打起来的，依我看，那纯属北方为了争取民心的宣传。北方资本财团唯利是图，要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他们不会为解放黑奴花一分钱的。

要了解美国南北战争的真正原因，要到南北双方经济上的利害冲突中去寻找。当时美国北方刚刚发展起来的新兴资本，竞争不过英国的老牌资本，因此强烈要求美国政府实行关税保护主义，来限制英国的诸如纺织品类的工业品流入美国市场。但是南方黑奴庄园主势力要求与英国实行自由贸易，他们用黑奴廉价生产出的农产品，如棉花，免税换取英国廉价的诸如纺织品类的工业品。北方在国会的票比南方多，想通过提高关税来逼南方买北方的货，南方不肯。南方因此要独立，要摆脱北方的控制。北方说不行，要维护统一，双方就打起来了。

中国文革时的派仗也不是一样吗？当一个群众组织中出现意见不同，双方争执不下的时候，

持少数意见的人往往不愿意服从多数人的意见或决议。他们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搞分裂，成立另外的组织，打起另外的旗帜。我们所熟悉的清华两大派，和北京的天派、地派之分不就是这样吗？

这种现象我在美国左派里也看到很多，尤其是托派组织。少数服从不了多数就一分再分，分到一个个左派组织小得不能再小为止。我想右派里也有类似现象，尤其是各种宗教组织，那分的可细了。

与其相反，大家看电视连续剧《井冈山》和《长征》反映的毛泽东，如何在错误路线的排斥下，仍然坚持少数服从多数，坚持民主集中制，没有搞分裂。有多少人能比得上他那样坚定的民主信念？那些说毛泽东不民主的人要么其实并不一定懂得什么是民主，不一定懂得民主的作用，不一定懂得民主所能解决的问题，不一定懂得阶级社会里民主和专政的关系，要么就是阶级敌人，根本无权评价毛泽东是否民主。

4.民主与“财主”的区别

西方国家喜欢把自己作为民主的标本，喜欢以民主老大哥自居，喜欢指责其他国家如何的不民主。按理说他们应该支持文革中兴起的群众组织，代表民意反对按西方来说是不民主的中国各级党政组织。其实不然。我发现他们怕群众。他们支持的是金钱能控制的民主，是资本以外的民主，是资本之间的民主，而不是资本（企业）以内的民主，不是群众自发的民主。

“不管它是什么样的民主，那好赖也是民主吗”，我的右派朋友们会说。西方的政治不是很民主吗？为什么在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多数会服从资产阶级少数呢？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要进一步分析资本主义民主的本质。

我认为，西方私有制下的民主实际上是股份制的“财主”。从微观上看，私有制的企业里不可能实行民主选举，因为投资者不会在私人企业里允许实行民主选举企业领导的方法把自己选掉。合资的资本家之间同样的也是以各自的投资量来决定谁说了算。他们之间实行的是按他们来说最合理的一股一票的股份制的“财主”，而不是一人一票的民主。

那么宏观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是怎么一回事？依我看，他们那里私有制下的民主是保证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条件下的民主，也就是说是资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的民主。其内容不过是在富人和穷人各交多少税上、国家应养多少兵上、政府应开多少支上、市场应如何管理上、环境应如何保护上等等的法律制定和政府官员人选的问题上用表面上看来是一人一票的方法去解决各个不同利害集团和阶级之间的矛盾的一个方法。

但是，西方民主理论的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如何防止所谓“多数人的暴政”(“thetyrannyofthemajority”)。他们用所谓的“人权”和"个人自由”来防止多数人对少数人财产的"掠夺”。因此，在西方民主制度下，至于私人财产是不是神圣不可侵犯，资本是不会让民主投票决定的。即使全民投票否决了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它也不会服从，会以武力来反抗。投票解决不了政权性质的问题。这也

就是为什么在资本实力强大的时候，和平进入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原因。

即便是在保证了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条件下，西方的民主实质上也并不是一人一票。如果在老百姓的民主压力下，一国或一地区出现了一些对资本不利的法规或人选，那么，资本除了其它的反抗方法以外，还可以使用拒绝投资的方法，造成经济下坡。在人们大量失业，生活普遍下降时，他们其中的很多人就会要求改变那些对资本不利的法规，要求那些反对资本的政府人选改变自己的立场，希望出笼一些迎合资本利益的政策来提高自己的经济地位。因此，谁手中的资本拥有量大，谁的利益就会有更多的人去迎合。由此可见，私有制下一人一票的民主的背后，实际上是一股一票“财主”的股份制。

5.为谁服务的民主阔论?

从这里我们看到专政的另一个含义。资产阶级专政的一个内容就是不允许人们用民主的方

法变私有制为公有制。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是他们宪法的根本，任何损害私有财产的行为都可能是违宪行为。资本花钱扶持的强大的国家机器就是为了捍卫私有制的。

无产阶级专政其实也一样，它也是不允许人们用民主的方法变公有制为私有制。这是因为在私有

制下，无产者得不到平等，摆脱不了受压迫和受剥削的处境。

但是资产阶级专政不能光靠它所控制的国家机器，不能光靠武力去镇压那些威胁私有制的人，更主要的还是靠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形态在社会上的统治地位，靠对民心的控制，靠人们对资本主义的认同。

这一思想的核心就是所谓的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它把私有制下人们的穷富差别归结于个人本事的大小，能力的高低，而不是归结于个人对资本控制的多少。它把私有制下人们为衣食住行所占有的物资和为发财致富所占有的资本混为一谈，让人们一同去捍卫。它鼓励人们事事都从个人私有和少数人利益出发，而不是从社会和多数人的全局利益出发。这就是资本主义下的民主在私有观念的影响下，捍卫的是私有制，进而资产阶级少数可以用民主的方法控制无产阶级多数的主要原因。

由此可见，资产阶级专政靠的是两大支柱:除了强大的国家机器以外，靠的是思想意识形态上的统治，靠的是对民心所向的左右。

因此，离开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形态在社会上的统治地位，离开思想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去高谈民主的阔论不就成了为资产阶级服务的阔论了吗？

5.民主标准的评价

在我所接触的知识分子中，很多人受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首先考虑的是他们个人的解放，个人的自由，而不是工人阶级的解放，无产者的自由，往往把是否有资本以外的民主，是否有资本之间的民主看成为最主要的问题，忽

略了阶级社会的阶级斗争,把阶级社会存在的剥削和压迫仅仅看为民主社会的不足。

在阶级社会里，我们衡量一个人，一个党，一个政府的标准不可能是超阶级的,抽象的标准。因此，我们不应该首先从它是否民主的角度出发来衡量，而是首先从它是为哪个阶级服务的角度出发。我们首先要问得是，它是站在无产阶级这一边捍卫公有制呢，还是站在资产阶级那一边捍卫私有制。在确定了是为谁服务了以后，咱们才谈得上是否民主的问题。

由于立场不同，结论就会完全相反。对美国总统林肯的评价也是一样。南方曾称林肯为暴君，而北方则称林肯为维护国家统一的英雄。

说到这里我就想起了对斯大林的评价问题。在我的印象里，斯大林是个很不民主的人。他不相信群众，喜欢包办代替，喜欢自己说了算。因此他不光没有教育苏联人民如何防修反修，他还给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带来了很多的困难。但是，那些咒骂斯大林

为暴君的人，我看很少考虑过斯大林到底是为哪个阶级服务的问题。

为什么在西方可以骂总统，而在中国不可以骂毛泽东？很多右派和不明真相的老百姓会问。我也想过这个问题。想来想去，我发现这个说法的毛病在于它用静止的方法来看问题，把政权比较巩固的帝国主义和刚刚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相比。

一方面，资产阶级的政权受到威胁时，它也不允许持不同政见者的存在。美国就有多次迫害持不同政见者的历史。比如说，美国独立战争后，很多亲英派被迫逃往加拿大。还有，美国内战时，双方排斥打击持不同政见者的事件大有记载。我们还记忆犹新就是美国在 50 年代，以麦卡西为代表的迫害共产党人的历史，更不用谈对当前反对美国入侵伊拉克人的监视和威胁。

另一方面，总的来讲，在西方，总统主要是资本的公仆，而不是其领袖，骂总统不危害私有制，因为骂的不是私有制，而是骂总统危害了自己利益的个别行为。在工厂，在私人企业里，你骂个老板试试。反过来，在中国你骂毛泽东，骂的不是他本人，而是它所代表的社会制度，你骂

的是这个制度的领袖。在美国内战时，你骂林肯人们就不会随便让你骂了，人们就会急了，因为林肯是个领袖，他不光代表了北方资本的利益，还代表了广大黑奴翻身解放的要求。

一旦无产阶级的政权巩固到了政治家仅仅是其公仆，而主要的不是其领袖的时候，你就可以放心的骂她了。

总而言之：一，民主是个手段，而不是目的；二，民主的追求来自无产者和来自资产者截然不同；三，民主的成果受民心的左右；四，民主只有在少数能够服从多数时才能起作用；五，民主有公有制下的民主和私有制下的“财主”之分；六，民主的阔论离不开阶级斗争；七，民主和阶级立场相比是一个次要的标准。

（二）民心问题

在对民主的范畴和作用的认识较清楚了以后，我想简单的谈一谈关于民心的几个问题

既然民心在根本上左右着民主的结果，那么为什么民心往往会被资产阶级所左右？除了其它原因外，我想私有制在人们思想上根深蒂固的影响，加上小资产阶级在人口中的较大比例可能是造成这一结果的一些主要的原因。即便是社会主义在一些国家的建立也很难有效的排除上千年私有观念的影响，也不可能在短期内改变小资产阶级在人口中的比例。

改造人的思想不像学数理化那样，读几本书，上几节课，经过一段实习就完了。世界观的改造是不可能在课堂上完成的。人们的思想改造主要的要来自

于阶级斗争的实践，来自于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我们容易客观地接受自然科学的真理。社会科学就不一样了。我们的个人利益影响着我们对其真理的接受。一加一等于二还是三，从实践中是很容易检验出来的。是公有制好还是私有制好，那就没有客观标准了。那就要看我们各自的阶级立场了。那种脱离阶级和阶级斗争现实的所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提法由此看来是别有用心的。

1.人性问题

如果人性的根本是自私的话，如果无产者的多数向往的是小资产阶级的那种搞单干的自由，而不是从无产阶级的全局利益出发的话，那么社会主义还有什么希望呢？是不是只有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思想才是符合人性的呢？是不是从全局利益出发的共产主义思想像私有制的捍卫者所说的那样是违背了人性的呢？

面对这一指责，我好久未能找到一个有力的反驳。后来我发现，资产阶级并不反对献身精神。打伊拉克的美国士兵开始就有很高的爱国主义士气，很受美国社会舆论的鼓励。但是那是以牺牲个人利益甚至生命为前提的献身精神，是和资本主义的个人利己主义不相符的精神。这不是很矛盾吗？看来资产阶级鼓励的是捍卫私有制的献身精神。当它需要老百姓为它的阶级利益牺牲的时候，它就不谈什么

个人主义的人性了。相反的，它却大谈那些勇于为资本制度献身的英雄主义了。它反对的是捍卫公有制的献身精神，反对的是在人民群众中树立凡事以被压迫者的全局利益出发的思想。这人性不就有了明显的阶级性了吗？

不光如此，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只有资产阶级在市场上的唯利是图是天经地义的，而为其服务的政客和其他国家机器的成员滥用职权，唯利是图则视为是腐败的。它要求所有的国家机器成员，包括军人、警察、法官、政客等，都不得以个人利益去牺牲资本的阶级利益。所谓的高薪养廉就是它收买这些人的一个方法，另一个方法就是用职业道德，社会舆论去约束。因此说资本主义是只反贪官，不反私有制这一“皇帝”的。

以此推断，凡事以全局利益出发的思想，是能够在公有制下，在人们的思想上占主导地位。我这样说不光是因为否则的话，社会主义只能是一种空想，而且是因为我相信如果资产阶级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能在老百姓中树立为资本效劳的爱国主义和培养职业道德，那么有什么理由怀疑无产阶级为了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不能在老百姓中同样的树立为整体献身的共产主义精神呢？

其实毛泽东时代在这一方面做的很成功。其实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能否在老百姓中树立以全局利益为出发点的思想，而在于干部。俗话说，上梁不正下

梁歪。如果大多数的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能够树立以全局利益为出发点的思想，那么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所以说问题的关键一方面是如何监督领导干部，另一方面是如何改造人们的思想。

2.私心问题

虽然社会主义在现阶段是符合大多数劳动人民的长远利益的，但是受私有观念的影响他们往往会做出危害自己长远利益的行为，他们往往会以个人的眼前利益和局部利益去牺牲他们的长远利益。

难道说共产主义者应该是没有私心了吗？我看是有的。问题不在于有否私心私欲。问题在于我们的私心私欲是靠牺牲全局利益来满足呢，还是靠把其归属为全局利益的一部分，靠水涨船高来满足。

我想到比如说排队买东西吧，如有人夹塞，我如没有私心,我为何会在乎人家夹不夹塞？即便我们是个旁观者,我们中间的很多人为什么也会一看到夹塞者就会对其怀有公愤呢？我们为什么要维护排队的秩序，维护正义呢？我看是因为只有维护排队这一秩序才能保证大家每个人的个人利益都能得到满足，而夹塞者只能以牺牲多数人的利益才能实现。这就是我们的正义感所在。

在北京挤过公共汽车的人都知道，要想维持排队的秩序很不容易。越是车少人多，越不容易。开始没有强制的手段是不行的。一旦大家都能自觉地维

护排队的秩序，强制的手段就没有必要了。物质条件改善了，车多了，自觉排队的人就会多起来了。

但是人们的旧习很难改变。有一次，我送一位年轻的中国朋友上飞机回国。大家知道飞机上是对号入座的，可他很可笑，偏要挤到排队上飞机的头一个，好像在北京挤惯了公共汽车，不挤在前边不舒服似的。

这反映了物质和精神的辩证关系。私有制的概念是在物质缺乏的条件下产生的。但它不会随着物质的丰富自然而然的消失。

（三）专政问题

公有制就像排队一样，也是一种秩序。在社会主义时期，公有制在经济上的秩序主要的就是按劳分配和从全局利益出发。所有那些过去按资本、按资格、按地位、按等级、按特权来分配的做法和以局部利益牺牲全局利益的行为都是违背这些原则的。无产者的个人利益是通过维护这一秩序来实现的。当人们还不能自觉地维护全局利益的时候，强制的手段是必不可少的。这个强制的手段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私有制是一种不同的秩序。它基本上以金钱多少来排队。有钱的不用挤公共汽车，不用挂号看病，不用担心子女的教育。资产阶级专政维护的就是这种秩序。你没钱你就得挤公共汽车，你就治不了病，

你就上不起学。那你只能怪你没本事。你有本事组织人们去反抗这一制度还不如用你的本事去为己牟利呢。因此不喜欢社会主义道路的是那些私心重，“有本事”的“精英”们，而不是老百姓。

1.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问题

那么什么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它和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有什么不同？我前些日子有个新的领悟，即：在私有制社会中的所有阶级和阶层里，除了市场和法律的制约以外，只有像个体农民、小业主、小商小贩和自由职业者等等的小资产阶级可以不受别人的制约，自己当老板，搞"单干"。工人不能那样做就不用说了，就连大财团的总裁也不可以想干啥就干啥，搞“单干”。他们要受董事会和其他合资者的制约，他们要向股民负责；办事要和别人合作，要协商，要谈判，要讨价还价。所以说只有小资产阶级最“自由”。除了“看不见的手”的制约以外，它想干啥就干啥。

搞“单干”的自由主义思想是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一个根本特点，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一个表现，是私有观念的一个反映。

在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干扰下，无产阶级的民主不一定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比如说，文革期间人民群众在大民主中所出现的派性问题，我想就和这种思想有个直接的联系。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在人民内部，往往少数不愿意服从多数局部利益不愿意

服从全局利益的一个根本的原因。很多人往往受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影响，喜欢拉山头，喜欢当老板，喜欢自己说了算，不愿意受组织的约束。在这些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下，群众中所反映出来的民心往往代表了他们个人的眼前和局部利益，往往是和他们的长远利益不相符的。

由此可见，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人们的思想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也就是双方在如何争取民心上的斗争将是一个长期的，艰难的斗争。

（四）结论

基于以上对民主和民心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资产阶级的民主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民主。当资产阶级还能左右民心的时候，民主是资产阶级实行专政，捍卫私有制的一个方法。无产阶级要捍卫自己的政权就要像资产阶级学习，就要不光是用武力去镇压那些反对公有制的人，还要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里，在对民心的左右上和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进行激烈的斗争才有可能巩固自己的政权。

对此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毛泽东要发起文化大革命，为什么说它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深处的一场大革命。

虽然作为无产阶级史无前例大民主实践的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民心被走资派左右了，政权被走资派篡夺了，但是无产阶级不会永远的被蒙蔽着。阶级斗

争的现实一步一步的教育着他们，迫使他们总结过去的经验，克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对自己的影响，担负起自己解放全人类的历史重任。

二、试论无产阶级的大民主

提要：上世纪全球社会主义遭受挫折的主观原因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还未掌握好无产阶级大民主的具体模式。文革中出现的相对独立的群众组织虽是无产阶级大民主的伟大实践，但因起步晚，经验少，未能有效阻止走资派，即后来的官僚资产阶级获权。本文试图以此为线索重新反思无产阶级大民主的内涵。

（一）引言

上个世纪，社会主义[①]运动在全球范围内经历了一场从十月革命发起的，到二战后全面蓬勃发展和壮大的，直至毛泽东去世后消亡的过程。认真总结这段历史是所有真正的共产党人和革命者所不能回避的。

上个世纪 30 年代世界范围内所经历的大萧条，和尔后发起的二次世界大战推动了全球的社会主义运动。而当今全球资本主义再次进入了严重的经济

① 我们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是以全民所有制为基础的、是以计划经济为主导的社会主义，是为消灭剥削，消灭阶级压迫，把共产主义作为其最终目标的社会主义；因而不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掌权的打着“全民国家、全民党”的假社会主义，不是反动法西斯式的国家社会主义，不是西欧资产阶级掌权的福利社会主义。

危机，我们却看不到多少真正的共产党人和革命者领导群众搞社会主义的形迹。这和社会主义在上个世纪的失败有着直接的关系。

在找出全球范围内社会主义失败的真正原因以前，共产党人和革命者有什么理由指望工人阶级中的广大群众会把社会主义当作是自己解放的道路呢？同样的，工人阶级凭什么会相信新的一代共产党人和革命者不会在掌权后再次摇身一变，把他们从阶级的公仆变成为压迫和剥削自己的主人？现在就是列宁所说的那种“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的时候。

（二）社会主义运动失败因素的分析

那么上次社会主义运动失败的根本原因到底在哪里？

客观上的因素至少有三个：一，从国内阶级力量对比来看，到目前为止，社会主义主要的还是在资本主义较薄弱的国家取得过胜利。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在这些国家还不充分，资本的活动余地比较宽容，而且属于小资产阶级的人群（主要是农民）占这些国家总人口的比例较高，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势力比较强。因此，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地斗争在这些国度里必然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专政失败的可能性也就相应的比较高。二，从国际阶级势力对比来看，社会主义的政权受到帝国主义的重重围剿。与帝

国主义相呼应的现代修正主义得到国际资本主义全方位的大力支持。三，从思想意识形态来看，资本主义的私有意

识和法权意识在人民群众中和工人阶级中还有着很深厚的影响。无论是在像东德那样资本主义已经比较发达的国家里，还是在像中国当时那样资本主义还不很发达的国家里都是如此。因而，作为人口少数的、以走资派为代表的新生资产阶级就有可能在两大阶级势力的对比上取得思想上、人心上，进而政治上的绝对优势。

但是社会主义失败的根本原因，我认为主要的还不能从客观因素中去寻找，而是要从共产党人和革命者所执行的路线方针政策中去寻找。就像中国革命在 30 年代中的经验教训一样，我们现在不会把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仅仅归根于国民党蒋介石的强大，而是归结于当时党的军事路线的错误。同样的，我们今天也不应该把社会主义的失败仅仅归根于资产阶级的强大。

资产阶级相对的强大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客观现实，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舞台和起点。但是，上个世纪的历史已经证明了，只要无产阶级[①]能够正确的

① 无产阶级指的是所有那些除了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以外没有其他生活来源的人，而不是一无所有的人。不像资产阶级故意混淆的那样，“无产”在这里指的是不占有生产资料而不是没有衣食住行所必需的生活资料。

总结经验，改变自己的斗争方式，改变自己的战略战术，就有可能改变两大阶级实力的对比，就有可能战胜资本主义，从而取得政权，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同样的，无产阶级要巩固政权，防备资本主义的复辟，也只能进一步的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再一次地改变自己的斗争方式和战略战术，因而就有可能再一次地改变两大阶级的实力对比，进而完成社会主义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过渡的历史使命。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无产阶级经过“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直至胜利”的运动规律。

那么对共产党人和革命者来说，什么是社会主义失败的主观原因呢？

现在看来，社会主义失败的最主要的一条主观原因就是当时的无产阶级政党，由于缺乏经验，没有能够及时地认识到党内走资派的危险性，因而没有认识到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社会主义制度的主要危险已不是国际帝国主义的威胁，已不是国内已被推翻的老的地主或资产阶级的复辟，而是如何防止无产阶级的政党、防止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走到自己的反面。因而当时的无产阶级政党没能够及时地采取有效的措施防止党的各级领导蜕化变质，因而没能够及时地、自觉地把党放在群众的监督下。

同时，社会主义时代的工人阶级还没有能够学会如何自觉有效的监督各级党政领导和政权机关，防止掌握国家机器的领导人把共产主义的政党变成

官僚资产阶级[1]的政党。从而使工人阶级丧失国家政权。

具体到中国，虽然以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们早就担心过革命后政权性质的改变，但是党内走资派形成和发展的速度远远超出了他们的预料。当他们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时，已经为时较晚。党内各级领导中“打天下坐天下”的思想已经非常普遍，“当官做老爷”、“论资排辈”的风气和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日益盛行，很少有自觉地接受群众监督的觉悟。

从一些老革命的回忆录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老一辈的革命家们解放以后看不惯群众对党和领导的批评，抵制组织起来的群众。打天下，坐天下的思想在中国社会相当浓厚。反映到党内来，有不少的干部是高高在上，眼无群众，整天忙碌于为私人争权夺利，并没有像鲁迅那样“俯首甘为孺子牛”。

这种现象一方面是由于中国革命的两个阶段性所造成的。也就是说很多党内的民主革命派在中国革命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换的时期掉队了，不愿意继续革命了。但是另一方面，在没有两个不同革命阶段的东欧和前苏联，党内官僚资产阶级的形成并不比中国的慢。所以说，如何防备无产阶级的政

① 在经济还不发达的原先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官僚资产阶级的出现起先表现在衣食住行、医疗、卫生和教育等的特权上。

党、防止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走到自己的反面是个具有普遍意义的难题。

虽然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为此发动了多次的党内整风和群众运动，从 1957 年的反右斗争（其实被党内官僚利用了，变成巩固他们统治的工具），到文革前夜的四清运动，等等，但是都未能从根本上阻止党内官僚资产阶级的形成。事实证明，要从根本上阻止党内官僚资产阶级的发展和壮大，光靠思想教育和党内整风是远远不够的。

等到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带领群众向党内走资派发动总攻的时候，党内官僚资产阶级已经基本形成。他们利用自己手中掌握的党政大权顽强地向无产阶级一再地发起反攻。他们时而转移斗争大方向，时而挑动群众斗群众，时而形左实右。而善良幼稚的无

产阶级则由于缺乏斗争经验，一再地受他们的左右，轻信了他们的许诺，陷入了派性的泥潭。加上当时人民内部矛盾和阶级对抗矛盾混淆在一起，一时难分难解。

等到官僚资产阶级上台，打着各种旗号，联合农民小资产阶级，把工人阶级一步步的边缘化后，善良的人们才逐步认识到党内资产阶级的本性。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又使得越来越多的人们认识到毛泽东生前对走资派本质的预言和警告是多么的正确呀！

现在我们要总结的就是那场资产阶级复辟和无产阶级反复辟斗争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使得工人阶级懂得如何防备下一代共产党人在掌权后从阶级的公仆变成为压迫和剥削自己的主人，使得共产党人和革命者不致重犯上次失败的错误，为将来再次登上历史舞台的无产阶级专政做好巩固其政权的理论准备。

我认为，那场历史经验和教训，归根到底就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没有能够及时地摸索出一条如何实行无产阶级大民主的具体的、行之有效的道路。下面，借纪念毛泽东诞辰 115 周年之际，就什么是无产阶级的

大民主，如何总结无产阶级大民主的社会实践谈一下我的一些初步的想法。

（三）无产阶级大民主的几个根本特点

1.无产阶级民主观的理论基础

虽然资产阶级在历史上的出现是伴随着私有制的社会化大生产①而来的，但是它的民主观却是建立在小生产的基础上的。它维护的是私有财产所有者之间的而不是雇主佣人之间的平等民主关系。因而它的民主是为权衡不同利益集团，避免你死我活同

① 社会化大生产指的是直接生产的规模超出了个人单干的范围，因而需要多个人的协作才能完成的生产。

归于尽般的斗争而设立的，以维护私有制为基础的，以表面上一人一票的现象来掩盖其实质上是一股一票“财主”间的民主。因此它排除了在人们经济生活中实质上的，劳动生产过程中的，或社会化生产内部的管理和被管理人们之间的广泛的平等民主关系。

与其相反的，作为资产阶级对立面的无产阶级把社会化大生产作为自己民主观的基础。它要争取的是所有大生产过程中的，所有有协作关系的人们之间的平等民主关系。因而它的民主范围包括了所有与社会化

大生产有关的和影响社会化大生产的，进而所有有生产关系的，人们之间的普遍的民主范围。

换句话说，无产阶级的民主观要求下至经济基础的每一个细节（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如何交换等等），上至上层建筑的每一个领域（文化，教育，管理，等）无产阶级都有神圣不可侵犯的发言权、参与权和决策表决权。

因此，无产阶级的大民主远远地超出了资产阶级有限的、局部的民主范畴，是普遍的，广泛的，是与私有制格格不入的民主，也是资产阶级极其恐怖的民主。

因此它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才有可能实现。

2.无产阶级大民主的经济基础

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制度是以资本主义的私有经济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的多党议会制，就其本质来说，是私人资本市场竞争在政治上的反映，是与其经济上分散的，多中心的形式和以资本的个人利益为出发点的市场竞争的经济基础相辅相成的。资本主义经济上的多中心，各自为政，反映到政治上就是多党制。资产阶级内部不同党派之争反映的是不同资本集团的利益冲突。除了对内维护私有制，对外侵略扩张以外，资产阶级并没有什么其它的全局利益可言。维护私有制的国家机器成为其全局利益的代表。

与其相反，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制度应该是建立在以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全局利益为出发点的计划经济上的。这是因为，只有计划经济才有可能使全社会的经济按照符合无产阶级的全局利益的方向发展，同时，只有建立在广泛的无产阶级大民主基础上的计划经济才有可能符合无产阶级的全局利益。

因此，与计划经济相辅相成的，代表无产阶级全局利益的政党只能是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维护无产阶级全局利益的国家只能是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这是因为多中心多党派都同时代表无产阶级的全局和长远利益，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同时也是在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

3.无产阶级大民主的追求

但是，无产阶级的大民主不是也不可能是仅仅停留在形式上的民主，不是也不可能是仅仅把资产阶级的民主形式扩大化，广泛化，普及化。

这里面有几方面的原因。

首先，无产阶级大民主的目的和资产阶级民主的目的是截然不同的。

前者是为了认定无产阶级的全局利益，探索个人、局部和全局利益的最佳权衡，探讨眼前和长远利益（如环保和生产，消费和积蓄）之间的相互关系，寻求社会资源在各行各业（如医疗，教育，科研和生产）之间的最佳比例，等等。由此可见，无产阶级大民主的内容贯穿于人类社会化生产活动的每一个细节。

而后者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权衡不同资本集团的利益冲突。

不同的目的需要不同的手段和形式。资产阶级民主的目的是通过三权鼎立、多党议会制的方法来实现的。

但是这一手段和形式对无产阶级认定什么是本阶级的全局利益并没有什么积极意义。

其次，由于目的和内容的截然不同，无产阶级大民主所依赖的世界观和资产阶级民主所依赖的世界观也是截然不同的。前者必须是以无产阶级的全局

利益为其出发点的，后者是以个人和小集团利益为其出发点的。在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主导下，即便是有了广泛的、普及的民主，它也只能走到自己的反面，走到维护私有制的局部民主中去。资产阶级一定是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来改造世界的，无产阶级要求解放，也就必须按照代表自己长远利益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观来改造世界。

但是，从资本主义社会脱胎而来的社会主义中的无产阶级和受上千年私有观念影响的劳动人民往往一时还摆脱不了资产阶级世界观对自己的影响，因此，仅仅套用资产阶级民主的方法，并不会确保无产阶级民主的目的，即寻求和探讨阶级全局利益的目的。

作为一种政治形态，资本主义有它一套内在的逻辑。至少在目前的生产力水平上，它是相对稳定的。对信

仰资本主义的人来说，历史已经结束了，它就是一个人类发展的终点站，不存在朝着哪个方向发展的问题。

与其相反，对信仰共产主义的无产者来说，社会主义只是一个过渡的政治形态，因此是一种不稳定的政治形态。它要么朝着共产主义的方向发展，要么朝着资本主义的方向发展。这两者之间的斗争贯穿整个过渡时期。因此，无产阶级的大民主是为着朝着共产主义方向发展而存在的民主。

一旦人们学会了凡事自觉地从全人类的全局和长远利益出发的时候，人类也就到了共产主义的社会。到了那个时候，阶级也就不存在了，也就无所谓民主了。

现在绝大多数的人会认为这是不现实的。但是从本人观察到的如美国、西欧和日本那样工业化高度发达的国家里，人们如何自觉地遵守交通规则的现象就可以看出共产主义行为准则的萌芽。在这些国家里，人们不是没有私心，但是由于人们已经从多种交通事故中总结出了一条道理，那就是，谁要是不自觉地遵守交通规则的话，谁的一生最后死于交通事故的概率就

会远远地高于他死于其他所有疾病的概率。因此，自觉地遵守交通规则便成为一种社会风气。

同样的，共产主义社会中的人们也会从社会化（甚至全球化）生产高度发达的生活中总结出一条真理：当人人都事事从人类的全局和长远的利益出发的话，每个人的长远利益就会得到最大的满足。一旦这种理念就像道德一样成为绝大多数人们的行为准则从而自觉地遵守它，捍卫它，政府的专政职能也就是多余的了，因此民主也就是多余的了。到那个时候，人们关于究竟什么是人类的全局利益的辩论就像当今科学家们对自然科学的探讨一样是个通过实践来检验的过程，而不是个民主决策的过程。

4.民主和集中之间的辩证关系

无产阶级的长远利益和全局利益要求的是无产阶级的民主一元论，而不是多元论。无产阶级民主一元论的核心就是民主集中制。小资产阶级对民主集中制的恐惧根源于它基于小生产的自由散漫性，根源于它事事从个人和小集团利益出发的特点。相反的，基于社会化大生产的工人阶级懂得为何要服从纪律，为何要有集中的领导，为何要有统一的行动。

无产阶级民主集中制的民主一元论是民主和集中的辩证统一，而不是资产阶级独裁的一元论。正因为如此，在关于什么样的具体政策，什么样的发展步骤才是符合无产阶级的全局和长远利益的问题上，只有经过大鸣大放大辩论，经过广泛的无产阶级大民主的参与和决策才能回答。

但是，光有民主，没有集中，民主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大家民主了半天，做出决定后，还是个各干各的，各行其是，那么民主就没有什么作用了。

对于无产阶级来说，问题的根本不在于要不要服从纪律，要不要集中的领导，要不要统一的行动。问题的根本是谁制定的纪律，和为谁的利益而制定的纪律；是谁挑选的领导，和为谁的利益而挑选的领导；是谁决定的统一行动，和为谁的利益而决定的统一行动。这就是无产阶级大民主的内涵。

资产阶级的民主并不是没有集中的。资产阶级民主形成的集中就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国家机器。通过资产阶级的民主过程选举出来的资产阶级的政府和政府制定的法律就是它集中的表现，是带有强制性的，是以国家机器为后盾的，是必须服从的集中。否则，资产阶级的民主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但是资产阶级的集中范围很小。对外，只是在军事和外交上的集中。对内，只是在市场经济游戏法则的执行上的集中。其他所有的领域都是资本独裁、资本说了算的、资本自由的领域，都是属于资本主义民主范畴以外的领域。

正如资产阶级的民主是靠资产阶级的集中政权来保证的，无产阶级的民主也离不开民主基础上的集中。无产阶级民主基础上的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无产阶级的政权，二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因而无产阶级民主的范围越广泛，无产阶级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就越全面。

5.无产阶级大民主的根本任务

但是，无产阶级的大民主除了以上所讲的追求以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

不受本阶级监督的权力，无论对资产阶级还是对无产阶级来说都是相当危险的。民主和独裁，作为两种不同的国家形式，是各国统治阶级所采用的两个解决各种社会矛盾的不同手段。当其政权受到威

胁时，资产阶级会允许暂时的独裁，如二战时的希特勒和 50-60 年代台湾和南韩的独裁政权。资本主义社会里长期的独裁政权往往会把它的服务对象限制于资产阶级中的一小部分人，甚至是独裁者自己，损害其他本阶级成员的利益。最终，资产阶级必须要求其政治家只能作为自己的公仆，不会容忍其政治家成为任意主宰自己的主人。世界各地早先的独裁政权，如拉丁美洲的阿根廷、巴西等，欧洲的西班牙，亚洲的菲律宾、南韩、台湾等，起先都是为了对付人民。后来要么是内部矛盾激化了，要么是需要改变手法了，一个一个被资产阶级形式上民主的政权所代替就说明了这一问题。

无产阶级的政权也是一样的。长期不受工农监督的社会主义政权迟早会导致其领导人员的蜕化变质，造成原无产阶级中的一部分人凌驾于无产阶级之上，变阶级的公仆为阶级的主人。虽然相比政权来说，民主是第二位的，也就是每个阶级只有在掌握了政权以后才谈得上阶级内部的民主问题。但是，缺乏阶级内部民主的无产阶级政权一定会走到自己的反面，从而使得无产阶级丧失自己的政权。这就是政权和民主之间的辩证关系。

从总结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我们会发现，一方面，共产党人和革命者正确的认为，社会主义，要完成其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过渡的历史使命，必须要有一个善于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

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的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这是因为，没有无产阶级先锋队领导，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下，在资产阶级的顽固反抗下，社会主义不会，也不可能自然的发展为共产主义。但是另一方面，共产党人和革命者后来也认识到，仅仅强调党的领导还不够。在无产阶级政党掌权以后，是否能够保持执政党的阶级本性反而成了社会主义完成其历史使命的最关键的障碍。应此，对自己的政权必须要有严格的监督和有效的制约是无产阶级从资产阶级的民主统治经验中学到的一个最主要的内容，也就是无产阶级民主的首要任务。

（四）无产阶级大民主的方式方法

1.资产阶级民主的方式方法不适用于无产阶级的大民主

在如何避免阶级公仆变成阶级主人的问题上，资产阶级通过三四百年的社会实践已经总结出了一整套的经验。这一资本主义社会实践的根本结晶就是资产阶级的三权鼎立多党议会制。这就是资产阶级民主的根本内容。

因为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利害冲突（目前美国所经历的金融危机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哪一个利益集团独霸了政权都会有损其他利益集团，因此对为自己服务的政权，他们必须力争有效的制约。

这种制约的关键就表现在立法，执法，和法律解释权的三权鼎立和多党议会制的体制上。它们之间在经济和政治上的矛盾主要是通过议会和竞选的形式来协调。举例说，假如一个厂家的污染损害下游旅游和房地产家的利益，双方就可以通过推荐代表各自利益的政客，花钱竞选，通过议会立法来调节双方的矛盾。资产阶级的这种民主方式就是资产阶级监督其政权，防止一方独霸的一个有效手段。

资产阶级的多党议会制和普选对资产阶级来说是他们阶级内部真正民主的表现，是他们赖以监督所有他们受雇政客的有效手段。但是对广大人民群众来说这只不过是个骗局。这是因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就其实质来说，是个一股一票的“财主”，而不是一人一票的民主。在不推翻私有制的前提下，广大人民群众选来选去只不过选的是哪一个统治阶级的成员和他（她）的主张有望少剥削少压迫自己罢了。

因此，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政党再多，对无产阶级也没有多大的好处。这是因为多党制解决不了那个阶级掌权的问题。谁掌权是阶级斗争的结果，而不是靠法制就能规定的了。法规是人定的，执行、修改靠的都是人。俗话说“活人不会被尿憋死”。任何法规如果妨碍了统治阶级的利益，它不会在法规的面前畏缩不前的。

很多人一谈起民主就把美国列为榜样，认为美国是个民主法律健全的国家，殊不知，好赖的法律都

是阶级斗争的反映。比如美国的劳工法中的罢工和工会组织条例，就是在上个世纪30年代工人运动高潮威胁下制定的。但是并不是制定的就完事了。对工人阶级有利的法律最终还要靠工人阶级去维护和监督其执行。健全法制不是问题的根本。法律的制定和执行是阶级斗争的产物，反映了各阶级之间，及阶级内部集团势力的权衡，也是阶级斗争的工具。

无产阶级的大民主不能简单地依靠法制和普选来体现。普选或人民代表大会的制度是重要的，但它不是根本的。这是因为普选或代表很容易被当权者左右，尤其是当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在劳动人民群众中还占上风的时候，他们更是容易被个人的眼前和局部的利益所左右，因而放弃本阶级的长远和全局的利益。

因为无产阶级只有消灭私有制，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无产者之间就不存在着根本的利害冲突。因此，基于目的、内容和世界观的不同，无产阶级专政的职能就主要的不在于如何调和其间的矛盾，无产阶级大民主的形式和方法也就不能简单地借用资产阶级民主的形式和方法，无产阶级对其政权的制约也就不会是照搬资产阶级的多党议会制的制约形式。

2.相对独立的群众组织是无产阶级制约当权者的一个全新的模式

无产阶级用什么方式方法来监督和制约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呢？靠什么方式来实现无产阶级的大民主呢？

无产阶级和自己的革命领袖对此作了很多的探索。

一方面，以十月革命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政权从根本上改变了劳动人民的政治和经济地位。工人阶级的生活得到了保证，不再受资本家的盘剥和奴役，领导和被领导之间的关系不再是敌对的关系。广大农民从封建和半封建的枷锁中解放了出来。广大人民通过苏维埃或人民代表大会的形式，在资本主义的形式民主还不很发达的国家迈出了管理国家的第一步。

但是另一方面，革命的实践又迫使无产阶级和自己的革命领袖放弃很多资产阶级形式上的民主方式，不得不努力探索出一条独特的无产阶级大民主的道路。

由于无产阶级大民主只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相对稳固的条件下才能去实践，所以它的经历还很短，经验还很不足，还必然具有很大的盲目性。就像

人们对任何事物的认识一样，无产阶级只有从革命的社会实践中才会一步步地认识到事物的本质，才能完成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

起先，十月革命到1920间的俄共（布）党内存在过公开的派别活动。这和资产阶级政党内部的派别形式很相似。后来在苏维埃政权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为了防止国内外的阶级敌人利用党内公开的派别活动来分裂党，分裂工人阶级的队伍，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俄共不得不取缔所有党内的公开的派别活动。

同时，为了对抗国家机构的官僚化，列宁去世前曾建议大大地增加俄共中央委员中工人的成分。列宁的早逝，没有能够给我们留下太多的探索无产阶级大民主道路的实践。后续的斯大林并没有继承列宁对无产阶级大民主道路的探索，他把对党内走资派的斗争误认为是对外部间谍或特务的斗争，没有发动群众去监督党的各级领导。

探索无产阶级大民主道路的实践就不得不落到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不甘放弃无产阶级专政的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者的肩上。

除了人民代表大会制那种形式上的民主以外，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者在农村合作社和人民公社里推行的民主管理制度是中国农民有史以来从未享受过的民主权利，在工业上推行的“两参一改三结合”的“鞍钢宪法”（即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

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工人三结合的技术改革）和反对“一长制”等措施是无产阶级民主的具体表现。

但是这些努力主要的还是表现在对基层的管理上面，还没有触及到无产阶级大民主的根本任务，也就是对政权的监督上。从 1957 年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为基础的整风反右，经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到文化大革命都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者为探索无产阶级大民主的道路，探索实现无产阶级大民主的根本任务所经历的过程。

文化大革命是这一探索的最高成果，是无产阶级大民主的最广泛的社会实践。这一社会实践的结晶就表现在相对独立的自发的群众组织上。这种以生产和工作单位为基础的相对独立的群众组织直接监督企业或单位甚至地方党和政府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民主最出色的表现，是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统治下的民主中可望不可及的一种全新的民主制约形式。这是文革中的一个伟大的创举。它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社会主义制度内部如何实行民主监督，如何实施制度内的制约关系开辟了一个全新的道路。

3.相对独立的群众组织在共有制[①]下制约当权派的作用

无产阶级要消灭一切压迫、剥削的旧制度，要解放全人类以至最后解放自己，说到底，最终依靠的还只能是人民群众自己组织起来为自己的长远利益而斗争。文革的经验证明，防止无产阶级政党变色的最有效的手段不是建立多个与其作竞选对手的政党，而是建立起多个能随时监督其一切工作的相对独立的群众组织。

人民只有组织起来才有力量。但是在反动统治下，不是群众不关心国家大事，而是统治阶级不允许他们关心国家大事。文革的经验证明，人民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有着本能的、自发的组织起来的要求和行为。文革初期那种以生产和工作单位为基础的，一

---

① 即人们常说的公有制。但是公有制的概念很不严格。它既可以是毛泽东时代所讲的生产资料共同掌握在劳动人民手中的公共所有制，即"一人一票"的全民所有制，又可以是后来为了混淆视听，为官僚资本打掩护的那种把属于官僚资本把握的国家所有或"公家"所有的那种所有制也称为"公有制"。严格的讲，私有制的对立面不是公有制，而是共有制。这也就是无产阶级政党的名称谓"共"产党而不是"公"产党的原因。再有，资本主义股份制的原则是"一股一票"而不是"一人一票"，因此股份制并不是像某些资本主义的御用文人所宣扬的那样也是一种共有制的形式。它是和共有制格格不入的。

群群的志同道合的群众自发组织在一起的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就证明了人民群众中蕴藏着巨大的自我组织的能力。

这种群众组织和其他类型的群众组织不同。它既不是像工会那样的组织，也不是现在时髦的所谓非官方组织。这是因为工会那样的组织在原则上是代表一个单位里面的全体职工的，因此必须是个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集中制的组织。相反的，民间的所谓非官方组织一般的是脱离基层的，漂浮在社会上的，或依靠基金会扶持的组织，因而并不是一个单位里群众自己的组织。因此，相对独立的群众组织是共有制下特有的组织，是私有制下除了经过工人斗争取得的工会[①]以外很难允许存在的组织。

文革期间的群众组织之所以是相对独立的是因为，一方面，它的存在是不需要地方党组织认可的，但是另一方面，它的活动范围和组织规模又是必须服从党中央的领导。因此它不是完全独立的组织。

这种相对独立的群众组织是群众自愿联合在一起的团体。它的组织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如果内部意见不一致，矛盾解决不了，他们随时可以分裂为多个

① 在如德国那样的资本主义国家里，私人企业在二战后允许工会派代表坐镇董事会上的几个席位。虽然这是资本对劳工势力的一种妥协，但目的最多只不过是为了维护一个企业里工人的局部利益，最多不过是对私有制的一个限制。它不会在根本上危害私有制。

不同的组织。因此，他们的基本组织原则不是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集中制。

这样，由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由于各种社会思潮的存在，各种各样的群众组织都会出现，他们都会或多或少的从自己的眼前或局部利益出发，他们之间的矛盾有时会是很激烈的。

群众中的派性也会反映到执政党内。同时，党内的派性斗争也会反映到群众中去。正因为党的民主集中制不允许派别的公开化才需要相对独立的群众组织来作补充。这样既保证了党的团结一致，又保证了不同意见的表达渠道。这就是辩证的统一。

很多党内各级的领导和老一辈的革命家们很难接受这种相对独立的群众组织。他们往往错误地认为坚持党的领导就不能允许有相对独立的群众组织。他们把党的组织本来是为了组织人民、领导人民闹革命而成立的组织，变成了取代群众独立组织起来的组织。说起来也怪：革命前，先是没有群众组织，靠的是共产党领导群众组织起来闹革命。革命后，很多共产党的干部又是不允许群众自己组织起来。文革的经验证实了对群众组织起来的态度就是分别真假革命者的试金石。

如果社会主义是符合人民群众的最高利益，如果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是让劳动人民当家作主，进而迈入共产主义，那么最终只有依赖人民群众才能维护它。相对独立的群众组织的重要性也就在这里：

它是监督各级权力机构政权性质的关键，它是社会主义民主的集中表现，它是培养工农群众直接领导社会的学校。正是在与各种错误的思想作斗争的过程中，无产阶级才会得到锻炼，其间的优秀人物才会涌现出来。

那些怕群众的思想，怕群众组织起来“乱”的思想都是错误的，是替官僚资本反动统治服务的思想。一方面，要民主就不能怕乱。西方国家民主竞选时不是很乱吗？乱在媒体上，乱在舆论上。但是社会上其它的方面并不一定乱，经济不乱，治安不乱，生活不乱。除非资产阶级政权面临象法国 1968 年那样的政治危机，民主的程序并不一定乱。西方国家乱的时候是阶级斗争造成的，而不是民主造成的。另一方面，文革中的“乱”有很多的是走资派挑动的，是阶级斗争的反映。

根据文革的经验，组织起来的群众可以开会议政，可以推选自己的代表作为革委会中的群众代表。有了群众组织作后盾，权力机构中的群众代表就不容易被架空了，说话就有份量了，就有可能真正起到监督的作用。

现在看来，文革的后期不该在革委会成立以后把群众组织解散掉。当时对群众组织中的无政府主义思潮的批判是对的，但是由此取缔相对独立的群众组织现在看来是错误的。群众组织的解散取消了

当权派的对立面，解除了工人阶级的武装，为走资派后来上台埋下了伏笔。

现在已是很明显的了：一个不受工人阶级监督的一党专制的政权不可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文革中出现的群众组织监督企业和地方的领导是为了防止企业和地方领导脱离群众，为了防止他们的资本主义倾向，为了防止新生资产阶级的产生。因此，群众组织的存在反映了政权的性质，群众组织的取消也预示了政权性质的转变。

当初解散群众组织的理由还有很多，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就是群众组织的派性问题。当时的派性斗争已经把中国拉到了内战的边缘。当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在人民中还有很大市场的时候，派性的产生是很自然的。

如何对待群众组织的派性问题，如何解决群众组织和党的关系问题是将来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必须进一步通过实践来解决的大问题。

但是原则上来讲，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就是既要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又要相对独立的群众组织的监督。这就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之一。

一方面，将来的无产阶级政党在夺取了政权以后必须把自己自觉地放在群众的监督之下，也就是说要有意识的培养相对独立的群众组织，培养工人阶级自我管理的能力。另一方面，无产阶级的广大群众必须学会如何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克制自

己的派性，尊重不同意见的存在，保障其他群众组织的权利。只有这样才能通过无产阶级的大民主来巩固无产阶级的政权，完成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

如果资产阶级经过几百年的实践能够学会在政权相对稳固的情况下用民主的方法来协调它们阶级内部的冲突，那么将来的无产阶级也一定能够学会用民主的方法来解决阶级内部的分歧。

（五）结论

用相对独立的群众组织来监督无产阶级的政权，来对付还处于萌芽状态的官僚资产阶级是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中找到了的一个无产阶级专政下防备资本主义复辟的有效手段之一。但是，由于无产阶级和新生官僚资产阶级双方力量在思想上，组织上的悬殊对比，他未能巩固其成果，未能将其常规化，因此未能在如何防备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上走完第一步。这只能靠将来的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以后把毛泽东那一辈未能完成的无产阶级大民主的事业进行到底。

三、照搬资产阶级民主的幼稚性

目前流行的，同巴黎公社两项原则思路不同的几个相关的非阶级观点是：要么认为只有多党议会制才能有效地对执政党进行监督；要么认为有了普选的民主，“还宪于民，还政于民”，才能有人民的监督;要么用法治来制约执政党，人民监督政府的问题才能解决[①]。

我认为这些观点反映了人们对资产阶级民主、宪政和法治的迷信，反映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实质缺乏清醒的认识。由于工人阶级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当家做主原则不光需要表现在政治层次上，而且必须表现在生产领域中，因此对于那些热衷于资产阶级民主的人们，我们不得不追问在社会化大生产中他们将如何实施自己的多党议会民主原则？在全民所有制的社会主义国家里，试问我们如何通过多党议会制来组织生产，比如铁路、航空等交通的运行，钢铁、汽车等工业的生产，

或机关单位学校的运作?我认为将来的无产阶级政党要避免以往的命运，就必须对资本主义的民主、

① 其实，这一思想在文革后期的 1974 年那个颇有影响的署名李一哲的《关于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大字报就有了。这张大字报很使人深思，当时像本人那样没有在资本主义社会生活过的人很容易被此文的观点所迷惑。

宪政和法治的现实与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经验做一个马列主义的对比分析和科学的总结。

（一）多党议会制是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否定

无产阶级专政是不能通过多党议会制来实现的。这一结论是在对资本主义的多党议会制有了根本的认识后方能得出。

1.私有制下的多党议会制民主的内涵与共有制民主的区别

众所周知，资本集团内部、公司内部、企业内部和为资本服务的军队内部是不可能实行多党议会制的。这是因为资本的本能是个人利益最大化，除了对外侵略扩张和对内镇压工人阶级以外，他们没有一个共同利益。因此资本之间的利益竞争需要有一个资本家们都能接受的游戏规则。这一规则的制定是资产阶级民主的根本任务。多党议会制只不过是为了避免资本之间利益的过激冲突而同归于尽，为了制定一个资本家们都能接受的游戏规则而设置的一种调解利益的机制罢了。

更进一步讲，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有个所谓“公众”领域和“私人”领域之分。资产阶级把个人生活和资本运转都看成是私人领域的活动。按照资本主

义的逻辑，政治活动属于公众领域，经济活动（企业和公司的经营）属于私人领域，两者的组织形式是截然对立的。在所谓私人领域既资本公司和企业内部，资产阶级实行的是严格专制的制度，在所谓公众领域，既为资本服务的协调资本之间关系的政治体制上，资产阶级实行的往往是多党议会制。

由于资产者之间相互竞争、排挤，他们阶级内部缺乏根本利益上的一致性，因此资本主义民主的核心在资产阶级专政下是维护资本一元一票原则、钱少的听从钱多的、相互制约、股份制为其根本特征的“财主”议会制。资本利益集团之间的独立性决定了他们在政治上的相互独立性。这是多党议会制的经济基础。

与资产阶级相反，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解放不了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只有消灭人压迫人的制度，无产阶级才能最终获得自身的解放。因此，除了那些希望通过个人奋斗达到个人解放（也就是试图脱离本阶级）的人以外，无产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

就那些关心阶级命运的人来说，无产阶级内部争论的是，到底什么才是本阶级的全局和总体利益的问题，而不是争论如何达到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游戏规则。比如在毛泽东时代，大家争论的是优先发展重工业还是农轻重妥善安排，是教育的提高优先还是普及优先，等等。将来在追求全局利益最大化的前

提下，无产阶级很有可能还要争论像转基因的安全一类的问题。只有通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无产阶级才能在具体的问题上对到底什么代表本阶级的全局和总体利益有个明确的认识，才有可能达到意见的一致。

因此，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下，政治活动和除了个人私生活以外的所有的需要相互协作的经济活动都属于“公众”领域，因而政治活动和经济活动两者之间不会有相互对立的组织形式。

从追求无产阶级全局利益最大化这一立场看问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消亡以前，只有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民主集中制才是符合无产阶级全局和总体利益的机制。代表无产阶级政治利益的就不可能是多党制，而只能是一个建立在民主集中制基础上的集中统一的政党。

无产阶级的总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一致性决定了这一点。多个政党同时代表无产阶级总体利益在逻辑上说不通。只有一个民主集中制的集中统一的政党才符合无产阶级的全局利益。无产阶级内部意见不一致的时候，只能是少数服从多数而不能是基于不同政见分裂为不同政党。如果确有多个无产阶级的政党同时出现，它只能是无产阶级还未掌权的情况下，表现的是无产阶级的不成熟。

虽然真理有时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但是到底什么是无产阶级的全局和整体利益必须是多数人说了

算。上世纪30年代毛主席在井冈山的斗争突出地显示了这一点。当错误路线占上风的时候，毛主席只好一边尽力地说服大家，一边耐心地等待大家通过实践的检验去领悟真理。毛主席那时没有搞分裂，因为只要大家的出发点和目的是一致的，革命者别无选择。一旦有些人的出发点和参加革命的目的与无产阶级的全局和总体利益相违背的话，党的分裂才是必然。俄国布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分裂就是一个例子。

2.多党议会制必然否定无产阶级的全局利益

如果社会主义期间无产阶级内部基于不同政见分裂为不同政党的话，让我们想像一下所谓无产阶级的多党制将是什么样的：一种可能是像工会那样按行业建党，比如说一个代表钢铁工人利益的，一个代表汽车工人利益的等等的政党相互竞争。这样，不可能有一个行业的政党是考虑工人阶级全局利益的政党。

另一个可能是按照观点建党。反映到每个企业里会有多个政党的成员同时竞争企业的领导权。这就是文革中出现过的派仗!派性的一个根本特征就是从个人或小集团利益出发而不是从全局利益出发。有了派仗，全局利益又是无人去考虑。

这两例的荒谬是显而易见的[1]。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符合无产阶级全局利益的只能是一个建立在民主集中制基础上的政党。由于无产阶级的政治和经济活动都是要服从无产阶级整体利益的，因此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社会主义社会中政治和经济的组织原则是一致的，除了个人生活以外，没有所谓“公众”和“私人”领域之分，任何有关无产阶级的建党学说都要通过如何在经济领域运行的验证。通过这一验证我们就很清楚地看出资产阶级的多党议会制从来就没有在生产领域，在企业内部运行，也不可能在企业内部运行。它只能是在企业外部，为权衡资本之间利益而设置的一个机制。

由此可见，有些人提出的所谓“无产阶级的多党制”，就像“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一样的似是而非，一样的荒谬。我们看问题要看本质而不能只看标签。即便是加上“社会主义”的标签的“地沟油”也还是“地沟油。”加个“无产阶级”或“社会主义”的定语改变不了“多党制”和“市场经济”的本质，就像在“妓院”前面加上个“社会主义的”改变不了“妓院”的性质，在“赌博”前面加上个“无产阶级的”改变不了“赌博”的性质一样。

---

① 其它一些空想的主张也是同样的荒谬，如工人阶级的政党应该分成什么“教育党”、“生产党”等等。这些“理论家”好像没有看懂列宁的《国家与革命》。

3.民主集中制的上层建筑与计划经济的经济基础

进一步地讲，一个社会的政治组织形式是由其生产的组织形式决定的，前者是为后者服务的。一定的生产方式和组织方式必须有与其相适应的政权或政治的组织方式。生产的组织形式是经济基础，政治的组织形式是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经济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

比如说，在一个以自给自足的小生产为其主要生产方式的封建社会里，封建王国的大小（除了君主之间的战争对生产力的破坏以外）对生产的影响不大，因而王国的大小主要依赖于自然条件所产生的语言和文化的差异，尤其是在欧洲。但是在商品和市场经济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社会里，社会化大生产逐步成为生产的主要形式。一方面，市场的大小和一个政权的版图紧密相关，资产阶级不会轻易允许个别的独立王国限制市场的完整，另一方面，由于生产的社会性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越演越烈，迫使资产阶级的国家对私人经济的干预越来越强（如目前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和各国的“救市”措施），冲击着“公众”和“私人”的领域之分。这些都是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经济基础的例子。

在一个无产阶级掌权的社会主义国家里，生产的社会性也是越来越高，越来越需要人们在生产之

间的协作。如果这一社会生产的目的是为无产阶级的全局利益服务的话，那么无产阶级为了兼顾个人利益和总体利益、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就必须要求个人利益服从总体利益、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与此相适应的经济上的组织形式就只能是以全盘利益统筹兼顾的计划经济而不是各自为政的市场经济。

与这种计划经济的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上层建筑还能有什么样的形式呢?也就是说除了少数服从多数、个人服从整体、局部服从全局的民主集中制以外，那种类似多党议会制的上层建筑能和计划经济相符吗?历史上还有过什么其它的前人创造出的与这一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相适应的政治组织形式吗?没有，也不可能有。

4.无产阶级专政的奋斗目标

目前很多人反对当局的专制，但是问题的根本不在于专制本身，而在于是哪一个阶级在实行专制。这是因为，有阶级的存在就有阶级的专制。就像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社会主义必须是计划经济的，但是有计划经济的社会（如那种子继父业的家族政权）不一定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社会主义一样，无产阶级的政党必须是集中统一的，但是集中统一的政党不一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无产阶级中的个人和总体利益的一致性并不否定无产阶级政治生活的多样性，

而是以一致性为基础的，也就是说无产阶级政治生活之所以有多样性就是因为本阶级的总体利益和作为阶级一员（而不是想跳出本阶级）的个人利益是一致的，只要还有人在还受压迫，整个阶级是得不到最后的解放。

比如说，无产阶级的内部有主要关注经济发展的无产者，有主要关注科学技术的无产者，有主要关注环境保护的无产者，有主要关注妇女解放的无产者，有主要关注民族平等的无产者，有主要关注文化教育的无产者，等等。无论各自关注的是什么，只要大家的基本出发点是和无产阶级的总体利益相一致的，奋斗的目标是造就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人人地位平等的新世界，把自己所关注的事业看成是无产阶级总体利益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那么这样的多样性才是明了和确定无产阶级总体利益的根本途径。但是无产阶级政治生活的这种多样性是和目的相互敌对的多党制无关的，阶级内部的意见的协调和统一是通过无产阶级的大民主[①]来实现的。多党制反而给走资派分裂工人阶级队伍，为走资派名正言顺地夺权提供了方便。

以上的分析应该足以说明，为什么照搬资产阶级的多党议会制并不能解决无产阶级专政下无产阶级面临的如何防止走资派夺权的问题。

---

① 可以参考本人 2008 年写的《试论无产阶级的大民主》一文。

（二）形式上的民主不能保证工人阶级政权的延续

这里我们要从所有制和民主的关系出发来分析资产阶级民主的实质。

1.所有制的性质决定着民主的内涵

虽然民主的核心理念是少数服从多数，但是在不同

的所有制下，它的内容却会截然的不同。那些对于资产阶级民主抱有幻想的人们忘了不是民主决定着所有制的性质，而是所有制的性质决定着民主的内涵。当今形式上的民主不会让工人阶级掌权是因为民主相对阶级的专政，相对生产资料的所有制来说是第二位的。财产的属性从来就是依靠暴力的革命或反革命决定的，而非民主来决定的。比如美国的独立是通过战争而非民主的方法获得的;美国黑人的解放是通过内战而非民主的方法获得的;中国实现耕者有其田是通过一场土地革命而不是通过民主的方法实现的。只有在所有制的问题确定了以后，才有民主可谈。

从韩丁的《翻身》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民主与所有制的关系。本人感叹道：

“所有制的变革是人民群众翻身、当家作主的先决条件。一个阶级要想获得民主，它首先必须成为统

治阶级。中国的农民不首先推翻封建土地所有制，它当什么家，作什么主?没有土改的民主会是什么样的民主?如果当时中国有像印度的那种所谓民主的话，在不推翻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前提下，无地农民又有什么办法改变自己的地位呢?

“我们知道，古希腊的民主是奴隶主的民主，但奴隶是没有民主权力的。美国独立战争后的民主其实也是奴隶主、资本家和庄园主的民主。那时除了黑奴没有民主权力以外，妇女和资产不足的人也是没有民主权力的。独立宣言的作者之一托玛斯•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本人就拥有几百个黑奴。他的民主概念里面根本就没有考虑黑奴的民主权力。

“就是目前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度里，工人阶级仍然最多只能参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民主，就资产阶级之间的争议(如大政府好还是小政府好、穷富人各上多少税等问题上)表示一下自己的意见，在资产阶级规定的游戏规则下‘自由’地选择雇佣自己的老板。但是工人阶级不能当家作主，因为在私有制下他没有管理、监督、决策资本活动的权力。

“没有这一权力，他为了生存就不得不讨资本的喜欢，受资本的奴役。没有这一权力，他的民主就只能是按照资本的利益来决定，在满足资本扩张的情况下他才有生路的民主。没有这一权力，他就不能限制资本通过对媒体的控制大造舆论的所谓‘言论自

由’去左右民心，民主就不能不成为拍资本马屁的民主。

“2008 年美国政府不就是以几万亿美元的砸钱方式去“惩罚”华尔街那些贪婪无耻的巨鳄金融寡头们的罪恶行为?全世界人民不都是正在为他们的罪恶埋单吗?不推翻私有制，美国和全世界的老百姓还有什么其他的选择?”①

我这里不是要贬低形式民主。民主程序固然重要，但是它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就是哪个阶级掌权的问题。我们只要看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普选结果就明白了。民主选举是无产阶级掌权的必要条件，但不是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来掌权的充足条件。也就是说，无产阶级的政权不能没有形式民主，但是光有形式民主还不够。

2.资产阶级民主的实质是“一元一票”的“财主”

至于为什么民主选举本身解决不了工人阶级掌权的问题，说到底是因为在人民大众中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意识形态目前还是资产阶级的。人民群众中一方面有着强烈的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社会

① 阳和平:《从韩丁的〈翻身〉看民主与土改的关系》，2011 年。

主义的旗号被众多资产阶级政权打着就是证据)[1](注10),但是也有着顽固的通过个人奋斗达到个人解放的习惯势力。个人利益和全局利益相冲突的时候,人们往往顾不到本阶级的全局利益。这就是为什么社会主义时期必须坚持党的领导的一个根本原因。

私有制下的民主说到底是拍资本马屁、讨好资本的民主。在私有制下,私有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资产阶级决不会允许人民群众以民主的方式变资本的私有财产为公共财产,从而动摇私有制。财产的归属问题从来就不是一个通过表决能决定的问题。资产阶级民主强调的是防备"多数人的暴政"。普选制是在老百姓普遍的认同资本主义和资本的权利以后才实行的。

一旦大家对资本主义的私有制不认同,资产阶级就不会坚持普选制。资产阶级上台的初期是这样的(有财产规定),将来也会是这样的。他们首先坚持的是私有制,在这一基础之上才有民主可言。由此可见,资本主义社会的权力中心是资本。

资本主义下的民主因而只能是"一元一票"的"财主"。

[1] 英国劳工党只是在近几年才把社会主义的目标从党章上删除,西欧多数执政党的党纲至今都有社会主义的内容,西班牙 2011 年前执政党的名称竟是"社会主义工人党"!

要是资本对选民喜欢的人物或法规不高兴，除政变、暗杀以外，它最温柔的反抗就是撤资。撤资以后这一地区的经济肯定会下滑，老百姓就会失业。只要选民的多数出于对私有制的认同，他们会指责把企业家“赶走”了的政客，而不是指责撤资者。他们会同情资本的处境，想到如果自己有一天发财了，他们也同样的会撤资（好像他们也会发财似的）。因此，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民主，为了经济的复苏，他们不得不乖乖地请回有利于资本的人选或法规。不推翻私有制，人民不能从根本上摆脱资本的控制，只能在讨好资本的方式方法上进行选择。

欧元区的人民当前不就是面临着这一问题吗?中外资产阶级的媒体一个劲儿地强调资本主义的一个“真理”：欧元区经济的恢复在于“投资者”的信心!认同私有制的人不拍“投资者”的马屁是活不下去的。①

与此相反，由于无产阶级内部根本利益的一致性，无产阶级专政下社会主义民主的核心是维护全局利益的、相互协商的、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集中

① 2012年夏天在山西潞城农村人们看到这样一个极其露骨的标语：“投资者是恩人，引资者是亲人，破坏投资环境者是罪人”。

制。在共有制[①]下，无产阶级同样也是不会允许任何人以民主的方式改变原来属于人民的公共财产为私有财产，

从而动摇和瓦解生产资料的共有制。民主，只有在像毛泽东时代那样的生产资料共有制下才有可能达到人民群众所渴望的真正的、广泛的、全面的、深入的人要达到这一点，无产阶级就必须同自己队伍中形形色色的各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形态进行长期不懈的斗争。否则，民心会被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所左右，简单的形式民主将会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坚持这一斗争的政治主体就是无产阶级的政党，而这一政党就必须是由那些把阶级利益看得高于个人利益的，那些捍卫共有制的人所组成。一旦这样的人成为人口的大多数，那么阶级、阶级的专政和国家都会消亡。

① 即人们常说的公有制。但是公有制的概念很不严格。它既可以是毛泽东时代所讲的生产资料共同掌握在劳动人民手中的公共所有制，即“一人一票”的全民所有制，又可以是后来为了混淆视听，为官僚资本打掩护的那种把属于官僚资本把握的国家所有或“公家”所有的那种所有制也称为“公有制”。严格的讲，私有制的对立面不是公有制，而是共有制。这也就是无产阶级政党的名称谓“共”产党而不是“公”产党的原因。再有，资本主义股份制的原则是“一股一票”而不是“一人一票”，因此股份制并不是像某些资本主义的御用文人所宣扬的那样也是一种共有制的形式。它是和共有制格格不入的。

由此可见，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当然离不开形式民主，但是我们把防备走资派夺权的希望寄托在形式民主上是徒劳的。

（三）法治手段不可能制止走资派的夺权

有人把维护共有制，防范走资派夺权的希望寄托在

法治的基础上。这是对阶级社会中法治所能够起到的作用的一种不切实际的有害的幻想。

1.法治缺乏对立法者的制约

同上，资本内部、公司内部、企业内部和为资本服务的军队内部实行的基本法则是专制而不是法治。当今我们看到的是法治越“健全”，贪官越丰满，这不就说明了法治并不制约统治阶级，反而是阶级统治和镇压的一种形式。

当前中国普遍存在的为房地产开发而导致的弓金拆事件就足以说明被压迫阶级最基本的核心利益是不能靠法治来保障的。又如劳动法的条款在工人相对无力反抗的情况下不过是一纸空文。这是因为法律和法规是由那些有权有势的人制定的，他们是不会真正地制定限制自己权利的法律和法规的。中国目前的现实足以说明纸上有的权力不一定实际上有，实际上有的权力不一定纸上有。

让我们进一步看看当今中国的工人阶级沦陷为所谓“弱势群体”条件下的法治对工人阶级来讲是什么样的法治。广东省2010年颁布了一个挂羊头卖狗肉的所谓“企业民主管理条例。”其中规定的民主只是针对工会内部而已，工人对企业的经营管理没有任何决策权。就连直接“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事项”也不过是仅仅有“知情、表达、参与、协商、监督”的权力罢了，企业运行的其他方面工人是没有任何过问的权力。就连自己的职工代表都要受资方的一票否决权制约。条例规定，一旦“职工代表与企业解除、中止或者终止劳动关系，其代表资格自行终止”。也就是说，反抗资本的职工代表一旦被资方开除就没有代表资格了!更有甚者，条例中还把工人的罢工权给剥夺了。它规定：在工资谈判期间，工人“不得采取停工、怠工或者其他过激行为。”条例赋予工人的唯一权力看来只有“骂娘”权!

就连像美国这样所谓“法制健全”的国家，一旦其政权自以为受到威胁，它就会是像“活人不会被尿憋死”那样去拯救自己，而不是像书呆子那样把自己栓在自己制定的法规条款上。日本二战偷袭珍珠港以后，美国政府不分青红皂白，把西海岸所有已是美国公民的日本后裔统统地关押在集中营里，什么宪法下的公民权一概没用。不满意者打官司吧，四十多年后他就是赢了，人也死了!美国麦肯锡时代对共产党人的迫害也是如此。

由此可见，法律上规定的言论自由一旦威胁了一个阶级的政权，它会被毫不犹豫地取消，人民的民主权利会遭到残暴地践踏。在阶级社会里，只有那些不威胁制度的言论才是自由的。一个政权越自信它就越能宽容。例如，一旦美国共产党人被美国的统治阶级从美国的工人运动和政府机构中清除干净以后，美国政府才对美国的共产党人表示了高度的“宽容”。因此有否反对政权的言论自由，反映的多是政权的自信程度，而和政权的性质其实关系并不大。

2.有约束力的法规反映着阶级的斗争

以上的观点并不是说法制不重要。相对人治来讲，法治是一种有章可循的治理形态，因此，可以理解为阶级矛盾规范化的一个形式。因而，它仍然是依靠强力来制约“不法”行为的方式，说到底也还是通过镇压来治理。在私有制下，法律和法规的各项条款，就其出发点和其要达到的报本目的来说，还是为了维护私有制的正常运行而制定的规则，是为了调解各私有者之间存在着的利害冲突不至于造成同归于尽的行动规则，是私有者之间进行竞争所必须遵守的游戏规则。

抽象地讲，任何一个制度、法规和规定必须有一个利益集团作为它的后盾去推动它的建立、敦促它的制定和监督它的执行。这是观察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所不可回避的结论。大的例子如资本主义

的私有制，没有资产阶级的大多数成员不顾倾家荡产地捍卫它，这一制度的建立和巩固是不可能的。小的例子如食品安全上的法规，没有得利者的利益集团去推动它的建立、敦促它的制定和监督它的执行，其结果就像当前很多中国出现的食品安全问题一样，规定算规定，执行归执行，再好的标准也如同虚设。因此，离开阶级斗争这一当前社会的基本现实去谈什么法制，是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

具体到一个统治阶级内部，法治的存在是以利害冲突各方的认可为前提的，也就是说争斗的各方必须权衡如何最有效的维护自己的利益。当出现利害冲突时，他们有至少三个选择：第一是在现有的游戏规则下维护自己的利益，第二是努力改变现有的游戏规则，第三是推翻现有的制度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如果相互利益冲突的一方认为自己的利益不能在现有的制度下获得保证的话，斗争的手段就会变成非法的手段。

美国的南北战争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所谓“法治健全”的美国社会南方大庄园奴隶主阶级之所以试图通过挑动南北战争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就是因为在当时的法规下，他们认为自己再也忍受不了北方工业势力通过如限制黑人奴隶制的推广和高额关税对他们利益的损害。由于他们改变不了当时的游戏规则，他们就只能试图推翻当时的制度来保障自己的利益。

进一步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在私有制下，法治仅仅指的是私有者之间的关系，对于所谓的私人领域，如资本企业内部的各种利害关系，无论多大的企业，都不存在什么法治，也没有什么民主可言，仅有的，是资本所有者的人治和独裁。这里是老板说了算的地方，是老板的天堂。即使有什么法治，也顶多是对劳工的待遇和环保的考虑上某些规定（而这些规定，从本质上说也仅仅是为了资本之间的“公平”竞争）罢了，其它企业中的问题都属于私人的领域，不在法治的范畴内。

从西方国家法治的历史和现状，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法律授予的权力靠自己去维护，法律不认可的权力靠自己的争斗来获得。如，罢工权是通过非法罢工获得的，结社权是通过非法结社获得的，迁居权是通过非法迁居获得的，等等。人民所享受的任何权利，起先都是非法的，都是通过非法斗争获来的。法不责众就是这个意思。合法斗争只能维持已有的权利，不能获取非法的权利。

因此，所谓“法治社会”中的法规只不过是对立各方阶级争斗的工具，但这个工具并不自动地为这里争斗的弱者服务。比如劳动法的最低工资标准给予了工人保障最低工资的一个法理依据，但是实际工资达不到最低工资标准的工人要想获得最低工资还要靠自己去争取。

3.法规是斗争的工具而不是目的

法律中的有实际约束力的具体条款反映着对立势力相互间力量的对比。它是对峙各方斗争的结果而不是斗争的目的或终点。实力的改变造成阶级斗争法规的改变，而不是法规的改变造成阶级实力的改变。正像战场上得不到的在谈判桌上同样妄想得到一样。

有法规就有获利者和受损者。所以任何法规都是获利和受损双方利益实体或利益集团相互间势力的权衡，一方示弱，它方就进攻。远的不说，就2010年发生的法国工人全国性的大罢工就是法国工人阶级维护自己权益的表现。近期又有希腊和西班牙人民的抗争。工人抗争了资方还如此猖狂，工人不抗争的话，自己的权益谁来维护?

如果获利的一方不去积极地维护对自己有利的条款，那么受损的一方就会趁机改变对己不利的条款。利益集团的一个最基本的维权方法就是通过结社行为来表诉自己的立场。这就是结社自由的根本原因。避开阶级之间的利益争斗，避开利益实体间的抗衡高谈法治就只能是文人的空谈。什么“要通过法治来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力”，什么“还宪与民，还政与民”等等，如果人民不自己组织起来主动地维护自己的基本权力，谁会去维护它?那些制定法制条款的是精英而不是人民，凭什么精英要维护人民的基本权力?他们的动机是什么?

在维护私有制的统治阶级内部，法规虽然提供了一个处理他们阶级内部矛盾的游戏规则，而且这些规则中有些可以为其它的阶级所利用，但是这是很有限的。一但被统治的阶级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这些法规上，它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处境。

没有结社自由，言论自由就无法保障。

所以，没有组织的利益集团其实就不是什么利益集团。无产阶级要想维护自己的利益，维护自己的政权就必须组织起来。虽然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形式，但是如上所述，代表本阶级整体利益的只能是无产阶级集中统一的政党。没有这一政党，无产阶级就无法行驶自己的权力。因此社会主义社会的权力中心是无产阶级的政党。

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当然离不开法律、法规、纪律等等的法治手段（后面会谈及），但以上论证表明，我们把防备走资派夺权的希望寄托在法治上是同样徒劳的。

四、民主是手段、靠的是专政

恩格斯晚年的民主思想很值得我们联系百多年的历史去研究。我发现议论民主的至少有两种人，一种讲它“是什么”，另一种讲他“要什么“，两者的区别就像摄影师与画家。讲他“要什么”的像画画儿的，喜欢从愿望出发，大谈民主应该是什么。我的想象力不太发达，更像个拍照的，比较注重观察现实中的民主到底是什么。

（一）民主的条件

简单地说来，政治上的民主靠的是专政。一个阶级的专政可以没有民主，但是民主离不开专政。

我猜很多人会觉得这个论点很奇怪，这是因为很多人往往把一个阶级的专政(dictator ship)与专制(authoritarianism)、独裁(dictator)混为一谈，没有注意到专制、独裁仅仅是阶级专政的个别形式，忽略了专政是民主的必要条件、先决条件或最根本的保证。阶级专政的实质内容就是不容质疑地动用国家暴力去捍卫财产的从属关系，也就是捍卫土地、企业等等的生产资料的调度权和产品的分配权归资产阶级的私人所有，私人说了算还是归无产阶级所有，无产阶级说了算。不容质疑就是绝不会允许任何人通过哪怕是最民主的方法改变生产资料的从属关系。

没有专政就不可能有民主，在我的观察里至少有两个层面的意思。

1、专政规范着民主的范畴；

2、专政保障着民主的运行。

比如没有无产阶级专政，毛泽东时代的农民不可能挑选村集体的领导，小岗村的18户也不可能三天两头换队长。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就不可能有文革，也轮不上造反派给各级领导贴大字报，更不可能有两派群众在工厂里互不相让地打派仗。文革期间两派的派仗，无论打得多么热火朝天，甚至发生武斗，但工资都照发。没有无产阶级专政，这在政治上是不可能被允许的，在经济上也是不可能支撑的。如果打派仗的工人一律扣工资，双方必定都会老老实实。因此，没有无产阶级的专政就不可能有无产阶级的民主，因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核心任务就是捍卫全民所有制，也就是捍卫人民群众管理国家的权利。

同样的，没有资产阶级专政，也就是没有军队、警察和法庭对私有财产的捍卫，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就不可能把民主的议题限制在私有制允许的范畴内，他们也就无法防备老百姓干预财团的运转，无法防备人民甚至试图通过民主的方法实行财产的“共产”。没有资产阶级专政，财团的老板在经济上也不可能随心所欲地砸钱去支持自己认可的政客去竞选，实现“一元一票”的“财主”。资产阶级认同的

民主是财大气粗的民主，视其在政治上随心所欲花钱的权利为他的“人权”。

（二）民主的理念

因此谈民主离不开对所有制前提的认识。所有制不同，民主的形式也必然会不同。

资产阶级民主观点的根本理念是制约均衡(check and balance)，因而他们把大量的精力花费在繁琐法制的设计上。这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统治阶级内部的一个最根本的矛盾就是如何保障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的有序竞争。他们在政治上的多党议会制、三权分立都是为这个目的服务的。虽然每个资本家都希望是自己说了算，自己成为大权独揽的独裁者，但是他们更害怕别人成为独裁者，破坏他们之间的“平等”竞争。为了防备专制或独裁者的出现，多党议会制、三权分立的相互制衡是最不坏的选择。各家老板通过砸钱推荐政客竞选来确定如何治理资本主义的国家。

但是政治上的相互制衡与社会化生产过程所需要的相互协调是互不相容的。所以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民主只能被限制在政治范畴以内，经济领域里没有民主可言。在这里资产阶级最认可“一元一票”的股份制。比如在一个资本集团内部，帮派体系的明争暗斗虽然有时会很激烈,但是并没有相互制衡的多党议会、三权分立，任何其他制度化的制衡体系也难以

出现，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矛盾一般也不可能通过民主的方法来处理。即便在政治上资产阶级实行了民主制，在生产领域他们实行的还是专横跋扈的独裁。被雇佣的无产阶级每日每时接触到的不是民主的体验，而是独断专行的老板。

无产阶级民主观的根本理念是以理服人，因而强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通过摆事实讲道理的大鸣大放来统一思想以便达到行动一致。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全民所有制社会里，一方面生产还必须有效运行，另一方面群众对领导的批评与监督也需要同时进行，因而民主的范畴不仅仅局限在政治领域，它也蕴含于经济的各个领域。如何从社会化大生产的视角出发，一方面服从协调各个领域有效运转的指挥者，而不是我行我素地各自为政，另一方面又能批评、监督甚至撤换这些领域的协调者，这才是无产阶级专政下民主的核心内容。因而在全民所有制下，要想通过以理服人的民主来处理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矛盾，比资本主义制度下相互制衡的民主要复杂得多，涉及到前人没有走过的社会化大生产领域的民主实践也就困难得多。

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领导和群众监督这一无产阶级专政下最大的人民内部矛盾，即民主与集中的矛盾，还不能通过废除任何一方来解决。因为没有先锋队的领导，四分五裂的无产阶级不可能掌权（有文革期间经久不息的派仗和武斗作证），而没有群众监督

的专政又不是无产阶级的专政。如何去处理这两者的关系无产阶级需要一步步去探索。

文革是无产阶级专政下民主探索最伟大的实践，为如何处理党的领导和群众监督这一矛盾迈出了极其重要的一大步，为后人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否定文革民主实践的人其实没有真正地认清全民所有制下民主的本质内容。他们指望无产阶级当家做主的民主照搬资产阶级理念下相互制衡的那一套是行不通的，因为那一套是为处理和协调相互独立的资本集团之间的争权夺利服务的,无济于解决无产阶级在全民所有制下所需要解决的社会化大生产领域里如何以理服人的民主实践。只有无产阶级内部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较深的那批人才会形成势不两立的对立集团，才会欣赏资产阶级制衡的那一套，才会以派别的利益替代阶级的利益，从而威胁无产阶级的专政。

（三）民主的手段

每个阶级都有至少两种处理各自内部矛盾的方法，一种是阶级内部少数人专制的、独裁的方法，一种是民主的方法。

要在阶级内部实行民主，多数就必须尊重少数的意见，少数就必须服从多数的决定。这两点决定了民主只适用于非对抗性矛盾，对于对抗性矛盾，民主不可能为继。

小的例子，比如说在一个微信群里，如果大家没有一个最基本的行为规则，不同观点或立场的对立如果导致了互相对骂或人身攻击，那么这个群就必然会撕裂。最终要么是一方退群，要么是剔除对立的另一方，双方不可能在一起和平共处。

大的例子，比如美国的内战，双方没有妥协余地时，就不得不用暴力来解决争端。这是阶级社会双方利益对立的必然结果。阶级利益的对立不可能长久地和平共处，也无法通过民主来消除，因此政治上的民主只能是阶级专政前提下协调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机制。

相比之下，科学上谁对谁错既不能用民主的方法，又不能用暴力的手段去解决，只能用实验的结果来证明，只能是以理服人。由此可见对民主的追求是由利益驱动的，没有利益的差异就无所谓民主的问题。

实际上，在现代的阶级社会里，人民能够享受到的民主权利与他们对社会制度的认同成正比。老百姓的民主权利越多证明他们对现有制度的认同越普遍，比如文革中老百姓所能够享受到的主人公地位是一个极端，英国工党能够享受到的权利是另一个极端。一个阶级的政权越巩固，他们就越有可能采取民主的方法来对付阶级内外的各种矛盾。

工人群众要想“享受”到资产阶级的民主，他们的绝大多数就必须认同资本主义，把它看成如同“能

者多得、借钱要还、财产继承“那样“天经地义“。他们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认同越彻底，资产阶级对他们越放心（如英国的工党），他们能够“享受”到的资产阶级民主就可能越丰富，甚至有望像英国工党那样成为执政党的成员。因此，当人民群众的大多数人还没有识破资产阶级民主的实质是协调资产阶级内部矛盾有效机制的时候，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权在形式上看起来就像是“人民的政权”。

一旦阶级矛盾尖锐化，人民群众的民主要求超出私有制所容忍的范围，那么资产阶级就需要通过直接的暴力去维护其政权，“人民政权”的真相就会暴露出来，比如巴黎公社，比如 30 年代的西班牙，比如 70 年代的智利。那时候资产阶级就顾不上通过民主的手段来温和地处理他们之间的矛盾，他们担心的首先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威胁，因而他们必须动用武力去镇压工人阶级的挑战，以便维持自己的统治。

（四）民主的锻炼

在资产阶级还能够使用民主的方法来摆平他们内部的各种矛盾的时候，工人阶级必须利用这种时期去加强自己的组织能力，提高群众的民主意识，比如工会的民主选举等等，以便更好地处理本阶级内部的矛盾，加强团结，进而有望争取更多的权利。

百多年来，工人阶级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借用资产阶级的民主，获得了比如 8 小时工作制、工会组织权、罢工权、社保和医保等等的权利。美国的黑人和其他有色种族通过长期的斗争还进一步地提高了自己的政治和经济地位，使得统治阶级越来越难借用种族矛盾来转嫁阶级矛盾。

虽然这些斗争或多或少都被资产阶级的宏观利益所吸收，也就是这些成果并没有违背资产阶级的宏观利益，但是它对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和组织能力的提高还是很有成效的。随着民主意识的深入人心，工人阶级内部的种族主义、排外情绪和对妇女的歧视就越来越难以为继，资本主义也成为越来越纯粹的资本主义。种族、性别和其他非阶级的关系被越来越赤裸裸的阶级压迫所代替，资产阶级在一国内转嫁危机的迂回之地也就越来越小。

工人阶级反抗种族、性别和阶级压迫的民主要求其实是人民群众渴望主宰自己命运本能的要求，因而实质上是试图改变所有制的要求。资产阶级之所以强烈谴责所谓“多数人的暴政”，其原因就在于此。与百多年前俄国带有复古主义色彩的民粹主义不同，今天所谓的“民粹主义”实质上有很大的成分是人民群众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提出的那些不尊重私有产权的民主要求，比如被西方列强强烈谴责的、违背了“借钱要还”原则的希腊主权债务的公投，比如 99%对 1%的占领华尔街运动等等。资产阶级本能地

把人民群众所有的那种危及私有制的民主要求往“民粹主义”的口袋里扔，甚至连种族主义、排外主义等反动思潮也往里面扔，以污名化这些危及私有制的诉求。所以，今日语境中的民粹主义实质上是底层老百姓对现存所有制的一种反抗。

工人阶级在争民主、求解放的斗争中，也必须有意识地去克服从资产阶级那里沾染上的霸道作风，学会用民主的方法去克服内部的分歧，从“反抗压迫”的斗争上升到“消灭压迫”的斗争，也就是从“改朝换代”的动机上升到“解放全人类”的胸怀，因而民主的熏陶对其成长和团结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相比之下，文革中派仗、武斗的泛滥，表现的就是工人阶级的不成熟。这与其没有经过长期的民主训练分不开。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内，有着长期民主熏陶的工人阶级内部，他们之间的武斗不敢说没有，即便有也罕见，组织起来的工人相互斗殴几乎不可能。养家糊口的工人不打工人是最起码的阶级觉悟。

（五）民主的功能

那么人民群众试图改变所有制的要求能否通过民主来实现？

有人认为只有先获得了民主工人阶级才有可能获得解放，全然不顾像印度这样一个自称为全球最大的民主国家，工人阶级的解放还遥遥无期的事实。他们不承认要先推翻资本主义，工人阶级才能获得

主宰自己命运的民主，而不是相反。他们幻想工人阶级可以通过民主的手段一步步地提高自己的地位直到成为统治阶级。但是历史的事实是无情的，除了暴力、宫廷政变，至今没有任何所有制的改变能够通过民主的方法来实现，这是因为，所有制的改变是对抗性的冲突，试图用民主的方法来改变所有制就像试图用洗衣机来做米饭一样地强人所难，超出了民主的功能范围。

国内那些没有经历过资产阶级民主实际运转的或亲自投身过民主过程的学者们往往对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主充满了各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做个不雅观的比喻）就像处男、处女热议性生活一样。

他们没有意识到普选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实施需要至少以下两个必要条件。一是上面说过的工人阶级的绝大多数必须依然认同私有制，因而不会提出改变所有制的民主要求;二是资本主义的垄断程度还没有达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最高形态，因此资产阶级内部的争权夺利只好通过普选来实现，否则就是内战。

他们以为民主的匮乏是封建势力的顽强所致，没有看到当今的世界，除了一些落后的国家以外，后起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已经没有多少反封建的内容。民主在这类国家的缺乏一般地来讲并不是封建势力的顽强造成的，而是急速工业化过程中劳资冲突尖锐化的表现，是资产阶级在这些地方不能像列强那

样比较轻易地通过转嫁危机来缓解国内的阶级矛盾，因而他们无法通过民主的方法来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结果。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越是欠缺，说明的恰恰是底层人民对现有制度下两极分化程度越加难以接受，那么民主的制度就会对现有的统治阶级造成越大的威胁。

人民群众在民主匮乏地区的民主运动因而有着天然的革命性。但是无产阶级决不能为了获得资产阶级所认同的民主，为获得更多的选票而放弃自己的政治主张，像尼泊尔共产党那样在获得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初步胜利以后终止了持续十多年的武装斗争。相比之下，菲律宾的共产党半个多世纪如一日地把农村的武装斗争和城市的议会斗争结合在一起，在马科斯十多年独裁统治期间顽强地带领人民进行反抗独裁，争取民主的斗争，在独裁统治被推翻以后又一方面积极参与着菲律宾的议会斗争，另一方面还至今领导着越来越兴旺的武装斗争。如果他们放弃武装斗争，他们在议会里的选票暂时也会大大地提高，但是他们并没有为了选票而放弃武装斗争。因为他们知道，议会斗争只是人民群众反抗资产阶级政权的一个战场，而不是最主要的战场。如何把争取民主的斗争与反抗资本主义的斗争结合在一起考验着所有这类国家的革命党人。

当然有些人会反驳我的这些观察，或许嫌我的拍照不全面，或许因为他们是画家，不喜欢我拍摄的

内容。从审美的角度看，我的民主照确实不如人家的民主画好看。没关系，我倒是喜欢他们有些人画的画。如果现实如同他们画的那样美，不亦乐乎？

五、争民主不能靠民主
——答风雨如等同志

风雨如等同志对我的《民主是手段，靠的是专政》一文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这里就其几个核心问题加以回复。

（一）无产阶级的民主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条件

风雨如同志文章的第一部分所表述的观点，我基本上是认同的，或许由于我的表述“一个阶级的专政可以没有民主……”不够准确，产生了一些误解。更准确的应该是：“剥削阶级的专政，

比如奴隶主、地主或资产阶级法西斯的专政可以没有政治民主，但是所有的民主政治都离不开专政。”我向来认为没有无产阶级的民主就没有无产阶级的专政，只是我的那个文章里说的是没有群众监督的专政不是无产阶级的专政，说的还是这个意思。无产阶级的性质决定了无产阶级专政必须以无产阶级的民主为条件，否则它推动的运动就只能是改朝换代而已。

当然除了政治民主以外还有团体的民主靠什么来维护的问题，比如无产阶级内部的民主也离不开

阶级的组织纪律，否则多数不尊重少数或少数不服从多数，阶级内部的民主必然被破坏，阶级的分裂必不可免。

以上说的是原则，但是无产阶级政权建立之初，其任务必然更多的集中于镇压反革命而非监督新政权。这期间无产阶级民主的表现主要是翻身解放了的无产阶级得以当家作主，不再受资产阶级的奴役，以及支持和组织农民兄弟打土豪分田地。监督新政权的民主措施只能是在革命风暴基本过去后，在新政权相对稳固下来后才能广泛地展开。即便如此，无产阶级内部的民主也是不可或缺的，典型的表现如延安时期数黄豆的选举。

但是风雨如同志把十月革命期间列宁为了强调无产阶级政权两个基本特征时说过的“无产阶级民主=无产阶级专政”的话不加解释地照搬到今天就难以说服被主流思想左右的打工人。我们说同一个货币有两面不等于正面与反面是一样的，就像我们不能说出生和死亡是一回事一样，虽然人人都有生死的过程。风雨如同志后面引用毛主席的话才解释了两者的关系，即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民主与专政的对象确实不一样，虽然两者都是无产阶级政权的真实写照。相比之下，声称没有民主就没有文革是同义反复，因为文革就是无产阶级民主的具体表现。

此外，风雨如同志的一些错误的论述或许是表述有误，比如说：“只有对人民实行民主，人民才能拥护这个政权。”毛主席说的是“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而不是“对”人民实行民主，两者相差十万八千里。当家作主的人民在内部实行民主不需要外界的恩赐，这是其一;其二不是为了人民拥护一个政权才“对”人民实行民主。民主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具体表现，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必要手段，是保障无产阶级专政不变色的必由之路。这些我想风雨如同志应该是认可的。

（二）民主的获得来自非民主的手段

风雨如同志文章的第二部分我有异议。他所引用恩格斯的话，尤其是列宁 1903 年的话：“没有政治自由，几百万人民就没有联合起来的可能“，有断章取义之嫌。凡是读了列宁原话的应该明白列宁说的是没有政治自由就不可能“合法”地把工人组织起来，而不是说除了合法的手段以外没有其他组织人民的方法。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的成功都否定了后者。

马列主义的论点都是有具体指向和条件的，离开恩格斯和列宁那些话的历史背景和语境，孤立地、绝对地看那些话就是荒谬的。比如，按照风雨如同志对恩格斯和列宁原话的理解，那么蒋介石 4•12 大屠杀以后共产党人的首要任务仍然必须是争取“政治

自由”，否则无法动员群众，这可是导师说的呀!然而，这不正是毛主席批评过的本本主义吗？难道武装斗争不是争取“政治自由”的具体行动吗?难道没有“政治自由”就不能动员群众吗?历史的答案是否定的。

理论误用的害处甚于没有理论。认为导师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论点的真理性在于它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反映了社会运动的客观规律。靠引经据典来论证自己的观点往往是一种唯心主义的方法，马恩列毛的方法是靠摆事实讲道理而不是靠引经据典。

好像风雨如同志也发现了自己的论点与革命实践相矛盾的地方，因而就添加了一个“‘井冈山道路’已经不再具有现实意义”的限制条件。可这个限制条件也就直接否定了他引用的那些马列语句的绝对性。

滠水农夫同志发文参与民主问题的探讨时错误地断言我与风雨如同志”争论的焦点之一是在资产阶级统治的条件下，无产阶级要不要争取资产阶级民主的问题”。

争民主是人民为了主宰自己的命运而必须的。没有民主才争民主，争民主就不能靠民主，就像我们不能靠喝空水杯止渴、靠拽着自己的鞋带或揪着自己的头发提起自己一样。由此可见风雨如同志的说法“无产阶级如果不拿起民主武器，也无法夺回自己

的民主地位”与实践不符。无产阶级必须利用资产阶级民主的武器，但是如果认为资产阶级的民主被剥夺了，无产阶级就只能束手无策地坐以待毙了，这种想法是错的。

风雨如同志应该知道除了民主的武器以外还有非民主的武器，比如美国工人的罢工权靠的是“赤手空拳”的工人通过非法罢工获得的，美国妇女、黑人的选举权和黑人子弟的教育权都是“赤手空拳”的人民靠长期的激烈的甚至流血的非法街头政治获得的。60 年代几乎年年夏季都进行的城市暴动和去年席卷美国大小城市的“黑命攸关”抗议游行和暴动才是推进种族平等的武器。

历史上，每个阶级的民主权力基本上都是靠暴力革命或暴力反革命获得的，而且人民群众的民主要求往往就是改变所有制的要求。比如新民主革命看起来是把民主作为奋斗目标的，而实际上是要推翻三座大山、改变所有制的一场通过武装斗争而非民主的手段进行的革命。革命向来依靠的是“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

（三）资产阶级民主的现状

风雨如同志以为“试想，如果世界各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都有了充分的言论、集会、结社、罢

工等等的自由（不是仅仅写在宪法上的），那么，当条件成熟时，资本主义还能存在一天以上吗？”

看来风雨如同志对西方民主的现状似乎了解得不多，也没有做什么调查研究，好像全部是基于百多年前马列原著对欧洲资产阶级民主的描述，以为世界各国资本主义之所以还能够存在，除了“条件”不成熟以外是因为那里的无产阶级没有“充分的言论、集会、结社、罢工等等的自由“所致。

殊不知，所谓的巴黎公社原则，在西方列强中基本上早已实现。那里的任何一个公民，要想发起一个罢免官员的公投，只要有足够的公民支持就可以实现。当然那里的官员也可以试图挫败这些公投，并且搞政治运动没有资金的支持是难以为继的，因而最终还是资本说了算。那里官员的薪金和高级技术工人相差不多，虽然腐败也屡见不鲜，但是太嚣张的也会被惩罚，毕竟那里的官员是资本的公仆而非主人。

或许风雨如同志对资产阶级民主的认识有误。在那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尤其是二战以后像北欧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里，他们实行的是实实在在的资产阶级的民主。它和无产阶级民主的差别就像象棋和围棋的差别一样，是“游戏”规则的差别。两者都有“言论、集会、结社、罢工等等的自由“，至于是否“充分”取决于各自的财力。从资产阶级的民主起到资本集团相互制衡的作用来说，它的民主

是真的;认为这种民主能够起到劳资之间相互制衡的作用，它的“民主”是假的。

民主是做决策的一种手段。至于什么属于民主决策的范畴取决于需要决策的内容，比如自然科学的对错不靠民主，打仗就必须当机立断，也不能靠民主，其他决策的范畴多由所有制来决定。资产阶级的民主是建立在"能者多得、食利致富、财产继承”等等一系列资本主义信条基础上的也就是私有制基础上的民主，是享有言论、集会、结社等等自由的但终究是财大气粗的民主，是建立在资本集团内部老板独断专行、集团之间相互制衡基础上的民主，是工人有罢工权，企业有解雇权的民主，而不是打工人可以过问企业运作或批评企业领导的民主，不是工人可以在企业里实行言论、集会、结社等等自由的民主。

要懂得资产阶级民主的本质就必须懂得在比如老牌帝国主义的国度里，资产阶级民主的范畴是严格地局限在所谓的公共领域里，对公共与私有领域的界限法律有着比较清楚的界定。政治是公共的，经济是私有的，因而生产和商业经营都不属于民主的范畴。但是随着资产阶级宏观与微观利益的权衡，公共与私有领域的界限也会随之而改变。比如最低工资标准、劳工保护、环保条款等，这些过去都是属于私有领域的，外界无权过问的议题随着资本主义危机的不断出现，资产阶级被迫从宏观视角去面对，为

了维护其宏观利益，这些议题不得不算在公共领域里，成为民主范畴的一部分。

与风雨如同志的断言截然相反，西方列强的民主制是非常发达的。大到国家元首的选举，小到社区的管理，都有一套民主的制度。比如靠地方税务支撑的教育，从如何征税到如何花费，老百姓参与的热情普遍地比较高。不像美国两党的赢者通吃制，大部分欧洲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是多党制，老百姓想什么、要什么从竞选中各党派所占的比例就能看出。但是由于选民的大多数目前还认同资本主义的基本理念，所以他们的民主要求一般地不会超越私有制的范畴，只是在公共领域里试图捍卫自己的权利，且他们的言论、集会、结社等等的自由在公共领域里还是相当充分的，比如席卷西方世界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就是一例。

西方列强的国内政治也必须是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制衡理念主导的民主。这是因为在那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相互竞争的垄断资本集团，除了严重的危机以外，一般不会允许个别的政治寡头垄断国家的政治，严重的舞弊行为会引起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激化，而各个财团也都不是好惹的，都有招兵买马的能力。因而在列强国家里，政客忽悠老百姓虽然是一贯的，但是投票结果资本集团还是必须尊重的，否则有导致内战的危险。比如这次美国大选，在没有任何系统性舞弊证据的情况下，拒不服输的川

普和川粉们仍然大喊舞弊，甚至冲击国会，威胁着美国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无论川普如何折腾，他的铁粉甚至建议军管或戒严，但是全部在世的 10 个前国防部长们一致公开声明，警告现役军人不要跟随川普走向违宪的犯罪道路。在美军参谋长已经多次声明不会参与竞选纠纷的情况下，作为陆海空三军司令的川普也不敢冒内战之险。

西方列强的民主制不光是为了协调资产阶级内部的利益冲突，同时它对缓和国内的阶级矛盾也起着重要的泄压阀的作用。除了通过转嫁危机来化解阶级冲突以外，人民群众的民主要求，凡是不违背资产阶级宏观利益的，比如妇女和黑人的选举权，比如最低工资标准、劳工保护和环保条款等等，他也迟早会接受，并以此化解阶级矛盾。同时他也善于把人民群众超出私有制允许的民主要求引导到党派政治的议会道路上去，比如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化解就是一例。风雨如同志所谓的“条件成熟”恰恰是当资产阶级再也不能通过民主的手段来化解阶级矛盾的时刻，也就是列宁所说的当统治阶级再也不能照旧统治下去，无产阶级再也无法照旧生存下去的时刻，而不是在民主制基础上的其他什么莫名其妙的“条件”。

与之相对照的是，连资产阶级内部相互制衡都无法实现的假民主往往集中在由政治寡头掌控的第三世界国家里。由于他们无法像列强那样转嫁危机，

那里的统治集团普遍地要么依靠舞弊作假，要么就直接的靠政变、军管来维护其统治，印度或是一个例外。印度的资产阶级之所以能够成功的使用相对民主的方式维持自己的统治，或是由于他们可以利用种姓制度和近百个民族和语言的隔阂来瓦解无产阶级的斗争。印度的工人阶级之所以还能在比如 2020 年初组织 2.5 亿人参加的全国性大罢工是因为目前工会和罢工还是合法的，是印度资产阶级自信的表现。与风雨如同志的“设想”恰恰相反，正是那些民主匮乏之国，资产阶级的政权才最脆弱。

（四）文革的结局并不是民主的匮乏所致

濊水农夫同志好像并没有仔细地思考我提出的论据，无视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相互制衡的民主理念与经济上社会化大生产过程所必要的相互协调是互不相容的这个基本事实，忽视了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政治和经济同属于一个统一的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民主范畴，不存在公共与私有领域之分，仍然坚持借用资产阶级的多党议会、三权分立、宪政等制度，回避这些制度在经济领域是根本无法实施的现实，甚至责怪无产阶级政权的丧失是民主的匮乏所致。以前说过的就不重复了，责怪民主匮乏的观点需要认真地对待。

实行民主的先决条件是多数必须尊重少数的意见，少数必须服从多数的决定。文革初期走资派打压

造反派，剥夺造反派的话语权，违背多数必须尊重少数意见的原则。造反派得势后全国各地迅速形成势不两立的敌对阵营，两派的武斗从 67 年夏延续到 68 年夏，山西等地甚至延续到 69 年夏，广西的武斗甚至丧心病狂地炸毁援越物资必经的铁路和桥梁，经久不息的派仗和越演越烈的武斗违背了少数必须服从多数决定的原则。这些都证明文革的结局不是民主的匮乏所致，而是派性破坏民主的结果，就像美国的内战不是因为没有民主，而是南方奴隶主集团拒绝服从国会多数的民主决定所致一样。

很多当年参与打派仗和武斗的派系头目至今不愿意反思自己的那些派性作为对无产阶级民主的破坏是多么的严重，反而抱怨文革中“一打三反”和对 516 分子的清查，甚至企图拿周恩来做文革结局的替罪羊，就像跟随张国焘的徐向前临死还要为西路军的毁灭推卸自己的责任一样。很多曾经的革命家、造反派，乃至川普类的资产阶级政客都非常的“倔”，都是拒不服输的人。他们的民主观是他做主，否则都不是民主。像清华蒯大富那样顽强地对待走资派打压的硬骨头“倔劲”是革命英雄主义的表现，但是从个人或局部利益出发，谁的话都听不进去，像托洛茨基那样“倔强”地一意孤行“不断折腾”打派仗，就会成为历史的罪人。这才是文革失败的根本原因。无产阶级只有在掌握正确划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

盾的方法之后，才能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才能成为当家作主的统治阶级。

附录：詹尤克专访阳和平

本文摘自《詹尤克专访阳和平——为建设一个真实的社会主义社会而奋斗》，此文对原英文版的访谈进行了部分的修改和更正。

翻译：激流网志愿者

每月论坛编者按

每月论坛编者按：以下对阳和平（Fred Engst）的专访由詹尤克（Onurcan Ulker）主持。访谈于 2017 年 4 月 7 日在北京进行。

同名文章由（印度）政治经济研究所（RUPE）于 2018 年 1 月 19 日首发。本文已经过编辑和重新排版。正如 RUPE 编辑在原文中所介绍的那样，阳和平的这篇专访“在亲身经历与深刻思考的基础之上，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透彻的解读”。的确，与我们之前发表的纠正反毛思想的文章一样，阳和平也有力地驳斥了对毛的主流评价。我们对“真正的‘中国奇迹’是社会主义”这一节印象特别深刻：有些人觉得毛泽东时代的经济增长不如后毛泽东时代，阳和平对这种论断进行了雄辩地反驳。通过对统计数据的直接比较，以及对如今学界“GDP 回溯计算方式”的明确批判，阳和平告诉我们“毛泽东时代建立的经济基础，为如今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根本前提。”

采访正文

詹尤克：很多其他发展中国家都经历了市场导向型改革，尤其是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开始。但时至今日，我们只谈“中国模式”的“成功经验”，国际财团推动的其他模式都失败了。其主要原因是什么？主流经济学家认为:后毛泽东时代中国的经济增长证明了市场经济优于所谓的“计划经济”，你觉得对吗？如果没有毛时代自力更生的重工业基础，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是否会取得如今的成就。

阳和平：很有意思，我发现主流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因是一无所知。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之所以发展困难，原因就在于帝国主义。一旦发现威胁到他们的垄断地位，帝国政府、跨国公司就会去摧毁第三世界国家的任何发展成就。当前中国能够崛起的根本原因就是在帝国主义时代维护住了主权的独立。毛泽东时代建立的经济基础为如今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根本的前提。这才是主要原因！时至今日，环顾世界，那个国家没有外国军队？哪个国家拥有完全地军事主权、政治主权和经济主权？只有俄罗斯和中国。印度可能也有一点。如果不理解帝国主义时代的经济发展逻辑，你就理解不了中国经济为什么能够发展起来。

历史实际上是相当具有讽刺性的：第三世界国家想要发展资本主义基础，就得先发展社会主义。毛主席曾经说过，“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我们现

在可以对其进行补充："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拯救第三世界的资本主义。"在帝国主义时代，第三世界国家想要发展资本主义，就只能与帝国主义先切割，获得经济发展的主动权。只有这样才能建立一个稳固强大的国民经济基础，才有可能重返世界资本经济的舞台。

詹尤克：听起来像萨米尔·阿明所提出的"脱钩理论"。

阳和平：说得对。要实现本土经济增长，你就需要脱钩。唯一可能的方式就是先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如果中国在 1949 年就对外开放，那现在和菲律宾就没有什么不同，也不会比印度更好。印度经济本应增长，但没有持续增长的能力。与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相比，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相对经济成就，源自于其主权独立。有了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中国自己决定跨国公司可以进入哪些生产部门。中国政府绝不允许国际资本进入能源、交通、重工、金融和其他核心经济领域，其余的部门，比如汽车行业，中国只允许他们以合资形式进入。跨国资本当然是想建立独资子公司，但中国政府说："就是这个条件，同不同意随你的便。想进入中国市场的话，就得合资。"

如果中国人从 1949 年就搞中外合资，会怎样呢？那时中国什么都没有。

实际上，当我 1974 年离开中国的时候，每个省份都有能力生产汽车。虽然质量不是很好，有些甚至

必须派师傅一路开一路修。但毕竟中国能够制造自己的汽车！一旦有了制造能力，就可以持续改进。如果你连汽车都做不了，一切也都无从谈起。当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的时候，政府要求他们搞中外合资。因为每个省份都已经有了汽车制造业，中国就可以对他们说："我可以造汽车的架构，我可以造轮胎，我可以造座椅，但我需要你的发动机、变速器，因为你们的比我们的好。其他的东西我们都能做。"这就是中外合资的运作模式。

中国得以再次融入资本主义世界，成为崛起的工业大国，原因就在于中国拥有了完整的、本土化的、全面的经济基础。其他第三世界国家，正因为没有这些作为前提，新自由主义的政策摧毁了他们的本土经济。菲律宾可能比其他国家更热衷于新自由主义，时至今日也没有什么成绩可言。什么都没有！真悲哀。一把钳子、一根钉子都做不出来。他们只能制造最基本的东西。市场里要么是跨国公司的商品，要么是从中国进口的廉价工业品。

詹尤克：如果我说错了可以随时纠正我。你的意思是说，多亏了毛时代的遗产，中国仍旧享受主权红利。那你如何评价中国当前的外国直接投资（FDIs）？长久以来，都说 FDI 是后毛泽东时代中国高速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阳和平：我想这个观点完全是牵强附会。我是说，事实不是这样。外国直接投资机构的确在中国起

着一定的作用，但我认为其作用被大多数学者夸大了。中国实际上就是在窃取西方的技术。在主权的保护下，大量的山寨产品得以模仿、盗版国外品牌获得好处。中国比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增速都要快，其原因就在于通过主权独立——经济独立、政独立治、军事独立——来缩小技术鸿沟，实现快速创新。可以大步前进，可以走捷径。中国没经历过固定电话，就直接步入移动通信时代。中国没发展录像机，就直接开始用 VCD 和 DVD。就算电影业今天也还是依赖于盗版好莱坞电影得以起步发展的。

让我举个例子明确一下：比如说，麦当劳进入了中国，中国从中学到了经验，本土的快餐行业就打败了麦当劳。再如，联邦快递进入了中国，现在已经被本土快递公司抢了风头。例子还有很多，但我们要注意：正是国家对核心领域的绝对主权，使得这一切成为可能，否则阿里巴巴、微信根本没戏。

詹尤克：那国内矛盾呢？比如说，后毛泽东时代，劳动力商品化带来的各种矛盾。中国新兴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和工作状况，特别是那些农民工的状况，是否威胁到了经济发展模式的可持续性？阳和平：我们从毛泽东时代还继承了一笔巨大的财富。学者们经常忽略这一点：他们不理解中国廉价劳动力的根源是什么？他们说是中国劳动力规模大，或者说是由于中国人口结构年轻。但是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也有这样的条件，为什么中国能享受人口红利，而

其他劳动力廉价的国家却无法发挥其人口优势？这就非常讽刺了。主流学者和西方新闻媒体就这些问题的解释上，做不到自圆其说。

这对我来说一度也是个难题，我去了几次菲律宾之后，就搞清楚了这个问题。我和当地人谈过话，试着理解他们国家的社会现实。我将菲律宾和中国做了对比，发现正是土改红利使得中国与众不同。土改给每个农民都分了一块土地，这就是中国劳动力廉价的关键。如果将中国、菲律宾的最低工资进行比较，你会发现相差不多。很多菲律宾的工人靠这个最低工资生活，陷于贫困之中。而中国的工人虽然工资差不多，但境况要好很多。为什么？因为在菲律宾这样的地方，失地农民被迫离开农村，进入城市谋生，依靠最低工资养活一大家子人，上有老下有小，全靠这笔工资。但中国“农民工”的家人并不完全指望他的工资，他们家里有地，抚养孩子，赡养父母的成本几乎为零。结论就是说：如果工人阶级劳动力的再生产是在农村进行的，就可以大大降低成本。但如果以失地农民的身份进入城市，居住成本、子女教育成本、老人护理成本就要高得多。中国农村六十岁、七十岁甚至八十岁的人还都在田园中劳作，他们能够自给自足。他们有着自己的房屋、自己的土地，即便哪天失去了劳动能力，他们还可以打电话雇人来耕种收割，他们做一些简单的工作就可以。所以，老年人并不是年轻人的负担。知道这个逻辑，你才能理解

中国廉价劳动力的成因。正是1949年的革命使得土改成为可能，如果没有土改的话，中国劳动力不会如此廉价。对此，资本主义学者理解不了（或者避而不谈）。

如今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原因也正是城市化。地方政府和炒房团将农民驱离土地以建立工业园区。将农民赶进城后，要想让他们生存，给出的工资一定要比之前更高。所以说，政府如今推动的城市化，恰恰正在提高中国劳动力的成本。这就是资本主义制度具有讽刺的地方。因此，我发现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解释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学者、资本主义经济学家其实并不理解它。

工人阶级当家做主的时期

詹尤克：就如何增加产量，你刚才讲到了，资本主义方式与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方式有着根本的区别。我认为这种区别根源在于认识论。毛主义的认识论基于以下假设：只有劳动者才拥有全部的社会实体知识，因为他们直接参与生产过程。而资本主义主张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是永恒的。我想正是毛主义的这种认识，促成了“上山下乡运动”。受过教育的年轻人被派往农村、工厂，去师从知识的真正主人，也就是工人和农民。你当时也参加过体力劳动。你从中学到了怎样的经验？你觉得毛泽东的方式真的可行吗？

阳和平：是的，当然可行。但主要问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目标是不一样的。打个比方，农用器械通常不是由坐在办公室里搞机械设计的工程师改进的，农夫更可能发现机器的缺陷所在。其实美国的农场往往有自己的车间，他们就在这里改进设备。农机经销商来了，看到了设备的改进，他们往往剽窃农夫的改进并将其完善。但知识必然是源自于实践；实践是所有知识的来源。资本主义社会的知识分子和工程师可以将这些知识理论化，而工厂里没受过正规教育的工人可能理论工作做的不如他们，但归根到底，工人积累的实践，才是知识的主要来源。

也正因此，毛主席提出劳动人民要知识化,知识分子要劳动化。将二者结合在一起，非常之重要。将知识系统化、理论化固然是其中的一方面，但我在中美两国的工作经历告诉我：最关键之处在于生产目的。在美国，我们工人尽可能不对管理层提出技术改进的建议，因为我们害怕丢工作。就是说，你可以提出改进建议，生产活动也会因此变得高效，但某些人可能会因此失业。所以，正因为工人和管理者的立场不同，工人就经常会破坏机械装置和生产线。老板们总爱说："我们都在一条船上。"当然，如果公司破产，工人就会失业，失去工资收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的确都在"同一条船上！"但我跟你讲：即便他们"破产了"，只是说他们没有多余的钱而已，但他们还有活路。工人失业了就一无所有。

然而，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生产完全是另一个目的。领导不能克扣工资，不能开除工人，因为工人有“铁饭碗”。如果工人觉得管理者的工作要求不正确，他就可以怼回去。劳动纪律自然是要有的，但从根本上讲，车间里的所有人都基本上是打成一片的。领导负责给出工作指示，但这些指示一定要让工人觉得合理。如果领导只是在办公室一坐，喝喝茶，看看报，给工人做做指示，你作为工人就可以跟他讲“不要老坐在办公室里，过来跟我们一起来干！”工人有权这样讲。

谁来当领导，也要经过工人的认可。这并非是选举的政治概念。但如果工人要求换个领导，而他们的要求未被上级接受，工人就可以罢工、怠工。所以任何领导要想领导的更有效率都要得到工人的认同。再强调一次：关键在于领导不能开除工人，也不能克扣工资，在于“铁饭碗”。如果我要对你进行领导，我不能强迫你。我对你的领导只能是建立在你的认同与理解的基础之上。这就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在生产方式上的差别！这就是人们参与生产过程改进的动力来源。我记得当时工人们提出了很多的建议。就如何处理一件事情，每个人的看法可能都不一样。有时候，比如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很多工厂的两派工人就因为冲突太严重以至于爆发了武斗。但不管怎么说，这是另一个问题。

有人会说，在毛泽东时代，工人阶级从未掌权。我不认同这种观点。实际上派系斗争和武斗恰恰说明工人阶级是掌权的。如果工人没掌权，他们就不可能因工厂的经营而发生冲突。对于工人阶级来说，派系斗争的确不是什么好事，甚至是严重的灾难。但它也证明，毛泽东时代的工人阶级确实具有领导地位。这就是历史的悖论。

詹尤克：你在工厂做工的时候，目睹过派系斗争吗？

阳和平：我所在的工厂里没有。但我听说了很多武斗的故事。文革初期我去了一家煤矿，那里就有辩论，但还没有发生武斗。不过无论是保守派为了保护他们的领导层，还是造反派批评他们的做法，都是通过写大字报，举行示威游行，还有组织集会来完成的……我们也参加了很多集会。

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工人阶级是社会的主人。工人之间产生矛盾时，该如何解决？这才是关键问题。时至今日，总听人们说“民主”。很多时候民主是统治的游戏！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每天都在进行着积极有效的民主实践！天呀！你跟我讲，工人们为了捍卫自认为是正确的而发生争执，甚至动武！如果这还不算是工人阶级执政，这能是什么？文革中的武斗是工人阶级不成熟的表象，而非工人阶级无权的象征。

城市和乡村，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

詹尤克：你如何理解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你在毛时代中国的生活经历对你有怎样的影响？

阳和平：这个问题值得好好谈谈。但实际上，我受到父母的影响更大。我的父母也是受他们父母的影响。我的外祖母卡玛丽塔•辛顿(CarmelitaHinton)创立了帕特尼高中，这个学校十分强调实践性学习。学校里有个农场，学生们除了给牛挤奶，喂料，他们也要做各种体育运动，去荒郊野外学习生存技能。这正是“动手实践”的方法，我的母亲也接受过这种教育。我的父亲是个奶农，他也是非常善于动手实践的。

但中国人的等级观念比较强。知识分子自觉高人一头，工人自觉低人一等。工人往往屈从于那些受过更多教育，掌握更多知识，拥有更多权威的人。我父母刚来中国的时候，他们很看不惯那些目中无人的知识分子。我受他们的影响很大，我在毛泽东时代受过的教育以及父母对我的影响共同塑造了我如今的思想观念。

詹尤克：在毛时代的政治运动中，被下放到农村、工厂的知识青年，如今无论在中西方学界都被称为“失落的一代“。高层权力斗争与这些知青并无任何关系，但却使他们牺牲了青春。你对此观点如何评价？

阳和平：很明显，我不认同这种看法。首先，这不只是权力斗争的问题，这更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我之前也提到过。“权力斗争”存在于统治者之间，存在于压迫者之间。在走资派之间，当时自然也有很多权力斗争。所以，在毛泽东时代，固然存在着走资派之间的权力斗争，但真正的斗争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就未来的发展道路之争。

至于你提到的知青“下乡”问题，确实非常有争议。谴责知青下乡决策的人，通常会忽略中国社会的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就是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是农民。实际上，被下放的知青在当时都多少享有一定的“特权”。我这里的说的“特权”指的是城市人口的福利匕匕农村更多，而这是工业化不可避免的结果。

中国是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因此必须走工业化的道路。但问题在于：如何实现工业化？你得有原始资本积累。中国不可能像之前英国那样，通过圈地赶人实现原始积累，也不能单纯靠剥削其他国家来积累资本。中国绝大部分人口都是农民，中国要怎样才能积累足够多的资本？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中国人口还是在农村。

基于这个事实，中国所能做的，要么是向农民征税，要么是进行工农业产品的不等价交换。但征税成本太高，难以持续。国家不得不主要通过工农业产品的不等价交换来积累工业化所需的资本，即工业品的定价高于其价值，而农产品的定价低于其价值。为

保证交换顺利进行，也为了避免投机倒把分子靠工农业剪刀差谋取私利，国家对农产品收购实行了垄断，同时也建立了户籍制度，以保障城市居民低成本购买粮食，工人仅凭较低的工资即可保障生存。粮食以低价从农民采购，工业品（包括布匹、暖水瓶、手电筒、锅碗瓢盆等轻工业产品）高价向农民出售。在当时的体系下，早期工业化必然需要这种非等价交换。

打个比方，一个纺织工人一年的劳动成果可以换回十几个甚至上百个农民一年的劳动成果。道理很简单：要开展工业化，国家需要开矿山，炼钢铁，制造生产设备，建设厂房等等。农民对这些东西没有任何需求。挖煤，挖铁矿石，将矿石熔炼成钢铁，用钢铁制造机器，造纺织机、造缝纫机，做衣服。这一切要有一个非常长的产业链，从事这些工作的工人需要吃饭。粮食从哪儿来？从农民那里来!不平等的交换就是这样开启了工业化的进程；这是工业化的基本逻辑。

实际上，这也符合农民的长期利益。因为，未来的农民不需要留在〃依耕作中从事原始而辛苦的劳动，工业化会将农民从繁重的农活中解放出来，取而代之的是农机具和拖拉机。但要造拖拉机，你需要有钢材；要炼钢，你得有铁矿和煤炭。这些东西不是农民一开始就买得到的。但集体化使采购机械成为可

能，也使得向城市供应粮食变得更加容易。这就是“户口”制度的根本逻辑。

但我们也要时刻想着对立统一。每件事都有正反两个方面。中国有个词很好：“无奈”，字面意思就是“最坏条件下的最不坏选择。”或者说“没有更好选择时的最佳选择。”的确，不平等的交换是中国当时进行资本积累的权宜之计，但也有负面影响：因为剪刀差制度的存在，城里人觉得他们的劳动匕比农民更有价值。事实当然不是这样的。“不平等交换”只不过是国家粮食专营的一个结果，但也成了城里人产生优越感的原因。城里人的衣食有保障，价格还很低；农民却因为粮食配给制度，不能随便搬到城市居住，否则就无粮可吃，无法生存。在城市中，只有城里人的粮食有保证；如果农民要进城，他得从村里自带干粮。

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者会说：这限制了人们迁徙的自由。实际上，你看看拉丁美洲、印度，还有其他经济欠发达国家的贫民窟，就知道这种“自由”会带来什么！那里的无地农民确实可以“自由”地迁徙！进一步地分析，之所以改开以后中国的“农民工”可以“自由”地外出打工是以中国工业化的原始积累早已完成为前提的。其实这些“低端人口”的居住条件和其他国家的“贫民窟"相差无几。

毛泽东时代的这种户籍制度的负面结果就是：城市的教育与医疗设施更加完善，城里人更容易接

触到文学艺术，城里人的生活改善的更快。这种地域分割是旧资本主义的特征，在社会主义社会延续了下来。城乡之间的差距已经十分巨大，而且这个差距还有不断扩大的趋势。我们能够做些什么呢？

送青年下乡就因此变得十分有意义。为什么？首先，它可以使城里人在某种程度上回馈农民。青年下乡为农村带来了知识、技术。其次，让城市青年见识农村生活，也给他们了一个明确的信息：别认为你在城里的特权是天赋的。你得知道农民是如何生活的，他们才是占国家人口的绝大多数，他们才是国家的支柱。你可以说这样做效率不高，但这并不重要。这毕竟是城市人口回馈农民的一种方式:城里人因其特权地位而得到福利，现在自然要向农民付出代价。

刚开始的时候，大多数青年还是比比较支持上山下乡政策的。他们知道农村的艰苦，他们也都经历过；他们觉得帮助农民是他们的职责。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开始，剪刀差可以大大减少，但很多不幸的事情发生了。“三年困难时期”[1959-61]之后，工业品价格应该下降，农产品价格应该上升，但国家却陷入了僵局，出现了有关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的斗争。很多事情没有顾得上去考虑。国家本应当一面送知青下乡，一面缩小工农业剪刀差。但当时问题太多，他们必须抓住主要矛盾。

邓小平当政后，破坏了知青下乡的政策。时至今日，有人说邓小平之所以取消政策是因为青年的反

抗。但青年人为什么反抗呢？就我所知，很少有人真正的研究这个问题。在毛泽东时代，并没有太多的青年反对这项政策。知青大规模的反抗始于 1977 年之后，即邓小平恢复了考试制度之后。所有的精英都离开农村去上大学。我们可以想象的到：和农民一起劳作的知青突然开始觉得："哦，我懂了，我应该永远呆在农村，可你们却离开了！"正是这种现象破坏了年轻人的意志，打破了年轻人的共识，最终摧毁了该政策推行的缘由。

詹尤克：在"伤痕文学"中也没提到这样的事实……

阳和平：是的，这就是我要说的！我完全理解青年人的观点。当所有人都一视同仁的时候，一切都没有太大的问题。但当一些人很明显的比另一些人"更平等"的情况下，他们的反抗也是必然的。

詹尤克：很多下放知青在日记中写过他们的农村经历。他们正是因此极少批判毛泽东去世后的政策转变。他们选择将毛时代的政策作为批判目标，尤其是上山下乡运动。

阳和平：是的。但据我所知，在 dxp 执政前没有多少知青反抗的材料。当然，有过艰辛，有过困难。1975 年出现了走后门风潮，在某种意义上，为 1977 年后结束上山下乡做出了铺垫。我见过几个上海知青谴责上山下乡政策，我就问了他们几个简单的问题："你们觉得自己为什么能享受上海户口带来的福

利，凭什么农民就应该为你们提供这些保障？而你们又对他们又做了什么？"他们只是说："这不管我的事！"

从个人角度讲，这些青年觉得社会对自己不公平。但大多数人，即便是那些批判上山下乡运动的人，对他们的那段生活往往有着难以忘却的回忆，甚至倍感自豪，并不时地流露出对那种生活气氛和人际之间友情的想往。他们在农村时的生活虽然很艰苦，但毕竟大家是在齐心协力搞建设，建设新中国，这总值得回忆。相比之下，如果大家是在工厂里受压迫，他们就不会有同样值得自豪的打工回忆。比如，在美国的电影文学中，我没有看到年轻工人兴高采烈地谈论工厂打工的"美好"时光。我在美国工厂打工十几年，这和在毛泽东时代的生活经历根本没法比。

在美国，我只在军人中看到这种对往事的歌颂。海军陆战队、陆军特种部队的战士退役后，他们通常会回忆起过去有趣的共同经历。因为军队里是一个团队，大家在一起共事。当然，这里他们是为帝国主义卖命，但从心理学的角度讲，在军队中服役给他们一种抱团的感觉。这种凝聚力，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工厂里是看不到的。

社会主义中国的社会福利

詹尤克：让我们回到之前的话题。在毛时代的中国，几乎所有公共服务都是免费提供，或者只收取一个象征性的费用。这多亏了城市的铁饭碗制度和农村的人民公社制度。然而，如今有一些改革派和主流学者批评这种福利，他们说，当时这些福利的水平是相当的低。毛时代中国的社会福利是个什么水平？这些福利真的改善了中国人民的生活吗？

阳和平：恕我做个小修正，不是一切都免费。首先你得是城市居民，这些服务没有涉及农民。有些是免费的，有些需要支付很低的费用。比如，住房并非都是完全免费的，你得支付象征性的房租。教育差不多是免费的，只需要支付书本费，但价格很便宜。

的确，当时的质量没有现在高。但在当时的条件约束下，这个福利体系的收益是巨大的。比如农村建立的“赤脚医生”模式，被世界公认为社会服务的成功典范。

詹尤克：连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都向其他第三世界国家推荐……

阳和平：是的，很了不起！赤脚医生的医疗水平当然没有医院高，但当时的医院对于绝大多数农民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即的。鉴于此，谴责赤脚医生水平差，简直是荒唐。你得看看当时的条件限制。我们得问问这些谴责者：有什么可以替代赤脚医生？中国

是个工业化进程中的一个贫穷国家。我们从未说过毛泽东时代的人民富有；我们一直都在讲我们是勒紧裤腰带搞建设的。毕竟我们是个穷国。所以这样指责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是完全没有依据的。

毛泽东时代的政策影响真的很大。中国的人均寿命大幅度地延长，中国人口寿命的增速在第三世界国家是领先的，在全世界范围来看也是相当快的。出乎我意料的是，即便是在毛泽东时代最恶劣的“三年困难时期”，最高的死亡率是2.5%，这样的死亡率在印度的当期属于“常态”。

有的人为了谴责毛泽东时代，编造出很多谎言。真令人难以置信！在自然科学中，比如物理、化学，我们可以做实验，我们可以做到客观。但是在社会科学中，颠倒黑白比较容易。自身利益会干扰我们的所见所闻，我们都不可避免有所偏颇。但这并不是说完全做不到客观公正，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公开宣扬我们的偏见。不幸的是，像弥尔顿•弗里德曼这样的资本主义辩护士完全受意识形态影响。我就纳闷了，他怎么就热衷于通过“亚洲四小龙”来说明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优越。他完全不提苏联的经验，他只是简单地选取能够支持自己观点的事例。

本书制作说明

本书是将阳和平关于民主的文章搜集整理编出的文集。附录部分是“詹尤克专访阳和平”。

阳和平同志是当代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亲身经历了中国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等重大历史事件，对新中国的历史有十分深刻的研究。灵活的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写出了一篇又一篇文章，为很多青年学生点明了方向。

他的文章都非常有参考价值和学习价值，十分值得我们去读一读，看一看。这几篇他关于民主的文章，同志们看了，应该会有非常大的启迪，能帮助同志们更上一层楼，在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上继续向前迈进。也能让对前途迷茫，一些看法有点问题的同志进步。

要想更好、更深入学习马列毛主义，不知道怎么入门、不知道如何把握学习原则、不知道按照什么书单徐循渐进学习马列毛主义的同志，建议阅读“烈火学社”出版的《马列毛主义学习路线》。

《马列毛主义学习路线》会进行不定期更新，最新版本会发布在墙外 Z-Library 网站上，至少提供 PDF 和 epub 两种格式，署名“烈火学社”，请在 Z-Library 网站上，搜索“马列毛主义学习路线”，查阅下载最新版本。